

新华书店编织绿岛地图

盛夏，武汉中心书城邀约“书香暑假”，一座座绿岛撑出荫凉。黄兴路35号，一幢欧式大楼门楣标出“他山书院”“书邻小境”，感觉别有洞天。一打听，原是新华书店华中管理处办公楼，也曾是过去戴笠的秘密机关“戴公馆”。戴笠（字雨农）飞机失事后，军统在此设立“雨农图书馆”，因此由新华书店对口接管。

新华书店1937年从延安清凉山发源，毛泽东1939、1948年两次题写店名，鲜明的文化形象走向全国。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中原新华书店总店南下，接管江汉路99号国民党的正中书局，设立门市部于29日开业。7月，中原总店迁汉，改名华中管理处。10月，华中管理处迁入黄兴路35号，后为湖北总店所在。相邻的天福里、崇德里，也合并更名为新华里。

江汉路99号门市部，晋升为武汉总店的“旗舰店”，一统背后交通路的古籍、科技、标准、教材、外文等专业门市部——它们大都是“书店一条街”的老底子。这里从1920年代起，中华、华中、世界、上海、开明、现代、大东、联营等此起彼伏。1937年秋，邹韬奋等创办的生活书店总店迁来，乃是著名的“文化救亡”阵地。

武昌司门口察院坡一带，清末民初早成书市。1920年春，恽代英等创办利群书社传播新文化，沿线有新亚、中东、成化、开智、文林等林林总总，以致后来新华书店走几步便有一家。胭脂路口小广场，星期天常办“特价书市”，每每淘回来意外喜悦。若是钟情学术类书籍，不惜远道去武大和华师，浓郁的学院气息为之倾倒。

自“阅龄”起航，脑海就印有一幅新华书店地图。汉口车站路设在1917年建的老铁路饭店，武昌民主路也入驻一栋四层西式老楼，更多的则是新建网点布局三镇——六渡桥在老会宾酒楼对门，航空路在武汉饭店裙楼，硚口在军需电影院近旁，古田在东风大楼转角，惠济路贴着解放公园，二七路挨着长江俱乐部，红钢城连着邮局报刊门市部，洪山紧邻武汉大学牌坊……闪现一代人匆匆赶来的身影，然后踌躇流连忘返的脚步。

1971年10月，武胜路新华书店开业轰动一时。这幢五层建筑雄踞十字街头，全省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面向江汉桥的滚滚车流，“地标级”存在。改革开放后，周边兴起文化市场，以图书批发为主，兼营邮品交换，树立为全国样板。

江汉桥那边，汉阳新华书店与汉阳百货大楼相望，今年元旦前夕在远洋里焕新回归，开业之日请出汉商集团原总经理麻建雄，举办“新华书店的老邻居”摄影、收藏作品展，一起重拾当年记忆。

适应新的需求，新华书店不少转型为“江城书房”，创新“书店+”跨界融合模式，营造时尚典雅的阅读环境。生活美学打底，咖香茶语弥漫，书架藤蔓披挂，入门即是绿岛……

（简桦）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陈诗亮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董 菲
杨 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海涛 王军振 王四清 刘海燕
朱永利 李 军 张智勇 李文洲
张冰峰 陈红英 林 伟 胡 蓉
唐云峰

主 编：阮祥红

副 主 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 行 主 编：丁星火

特 约 编 审：简 桦

本期责任编辑：刘 玮

编 辑：许 濛 章旷怡

封 面 设 计：王 鹏

阅城偶记

<<< <

1 新华书店编织绿岛地图 / 简 桦

时代年轮

<<< <

4 1986，钢花新村崛起全省最大住宅区 / 钟 钢

风雨同舟

<<< <

11 用脚步丈量民情 以笔墨传递民意 / 朱淑敏

九城同心

<<< <

16 一湖清水入画来——赤壁陆水湖“大水缸”保护亲历记
/ 李满林

委员天地

<<< <

21 向光而行：轮椅上的履职之路

/ 董 明（口述） 银 华（整理）

25 做黄陂基层法治的守护者 / 胡生浩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商聚汉皋



29 做好玩的中国游戏，讲动听的世界故事 / 曾 彬

人物述林



34 周恩来在武汉的抗战足迹 / 梅兴无

42 吴石将军在武汉抗战中的著述（下） / 邓正兵 任泰宇

都市寻踪



48 《奏办湖北武汉劝业奖进会报告书》前言
——“武汉劝业奖进会二题”之一 / 涂文学

52 1954 / 1931：武汉防汛老照片 / 侯红志

扫街探疑



58 “荆楚雄风”背后的鲜为人知 / 韩少斌

往事漫忆



63 我在汉正街长大（四） / 李胜洪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whzxwszl@163.com

1986，钢花新村崛起全省最大住宅区

◇ 钟 钢

轮印：40年——1986年8月1日，武钢钢花新村西区开始交房。7年后，钢花新村东区全面建成。钢花新村总计住房1.39万套，占地面积近100万平方米，居住面积约90万平方米，为湖北省规模最大的住宅区，荣获“湖北省优秀规划设计”。

今年“五一”，12号线一期工程开通运营，钢花新村的老居民完全没有想到，40年后在家门口坐上了地铁，而且恰巧东、西区各有一座地铁站——一边是10号线工业路站，一边为12号线钢都花园站。12号线串联三镇，为武汉市首条地铁环线，全长59.9公里，亚洲第一。12号线从钢都花园始发，终点汉阳墨水湖公园，沿线可连通其他地铁线，出行更加方便。据悉，10号线也将在今年内开通。

四十年前在青山，尽管没有地铁，能住进钢花新村绝对令人艳羡。如今，当我徜徉在这一片武钢职工住宅区时，仍会感叹它的宏大。钢花新村占地面积近100万平方米，相当于140个标准足球场。长约2800米，沿友谊大道（原武青三千道）东起工业三路，西止三弓路；从工业路与友谊大道交叉口向北到黄州路，约400米是它的宽度。钢花新村以工业路为界，分东（工业三路到工业路）、西（工业路至三弓路）两个片区。

1986年8月1日，钢花新村西区开始交房。8月2日，《湖北日报》头版报道《实行综合开发 创造建设高速度——武钢钢花新村住宅开始“交钥匙”》：“钢花新村位于红钢城附近，是迄今我省规模最大的住宅区。整个住宅区占地约1500亩，分东、



钢花新村西区当年新貌

西区建设。目前基本建成的西区有各种房屋200余栋……可居住3万余人。”

9月15日，钢花新村西区竣工，包括116、117、118、119、120共5个街坊，其中117街坊属于一冶自建职工住宅。同步建成的还有幼儿园、中小学和商业服务网点及公用辅助设施。

规划，先西后东

在钢花新村之前，武钢职工住宅分布在青山区红钢城、冶金街、工人村、白玉山四个生活区和火官庙、新武东两个住宅点。这些生活区兴建于1954至1984年。企业不断发展，住宅建设却赶不上职工增加的速度。1984年武钢统计数据表明，青山厂区职工无房和住房拥挤户共计17000余户。

武钢把改善职工住房条件提上紧急实施日程，职代会讨论通过决议——1984年及以后数年的住宅建设重点是兴建钢花新村。这一年，恰逢武钢划归武汉市属地管理。武汉市十分重视大企业发展，确立钢花新村为重点项目并立马征地，划洪山区和平

乡大洲村部分菜地为建设用地。东西两区一次圈定，先西后东分期实施，按照城市综合开发统一规划、统一征地拆迁、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配套、统一管理的方针建设。

西区征地47.44万平方米，含武钢原征地116街坊10.65万平方米。1984年10月，武钢设计院“钢花新村（西区）设计方案”中标，随后开展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武钢四个街坊规划总建筑面积50.90万平方

米，其中居住建筑面积44.75万平方米，可住29985人。武钢自筹建设投资约1.2亿元。

116街坊在此前定为中级知识分子居住区，职工称其住宅楼为“中知楼”。116、118、120街坊临武青三干道北侧布局。每个街坊都以一个游园式绿地为中心，住宅组团环绕，空间外密内疏。住宅楼条式6层、点式8层，巧妙布局，高低错落。另外，在116街坊南三角区建一栋（3个单元）高层住宅。1995年，武钢又扩大钢花新村西区容量，在武青三干道的建设一路与三弓路之间建成121街坊，与一路之隔的120街坊并列。

1986年，武钢设计院“钢花新村规划设计”，分别被武汉市、湖北省评为“优秀规划设计”。经湖北省推荐至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参加全国评比。

西区建设竣工，东区筹建提前上马。经武汉市政府批准，钢花新村东区征地40多万平方米。1986年9月，由武汉市建委、规划局、城市综合开发总公司及武钢共同主持，征集规划设计方案。武钢设计院、武汉市建筑设计院、珠海建筑设计院、常州建筑

设计院积极投标。1987年10月，经专家评审并报市政府批准，“武钢院”和“珠海院”方案评为优秀。

1988年5月25日，“两院”共同完成钢花东区初步设计。6月10日至11日，武汉市建委、市规划局组织由19家单位的专家组成的审查委员会认为：东区初步设计风格突出，建筑造型比西区又进一步，解决了单体与总体的关系问题。审查批准后，“两院”分工协作设计施工图。

钢花新村东区总建筑面积50余万平方米，其中居住面积45万多平方米，可供7250户职工居住。投资概算2.17亿元。

东区包括108、109、110、111、112、113、114、115共8个街坊。109、112、115三个街坊仍是临武青三千道北侧布局，115街坊的一部分还跨过武青三千道，在道路南侧形成一个街坊，称为钢花南区。

东区总体布局新颖活泼，街坊按规模大小划分若干互相呼应的基本组团。针对武汉气候特点，15种型号的住宅楼均按南北方向布置，以6层条式为主。对7层及以上砖混住宅，结构上按7级地震设防。公用建筑及设施既集中又分散，以方便居民；辅助用房利用连廊节约用地，经济技术指标高、社会效益好。街坊内大块集中绿地与多层次绿植相映成趣，环境优美。

四十多年之后，我想采访的武钢设计院宋泽莉高级工程师已经辞世，她的徒弟万维晓高级工程师也已退休。万维晓感慨良久，院里许多人为钢花新村的设计付出了心血。1984年，万维晓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建筑工程专业毕业，分配到武钢设计院民建科。科里当时分设钢花新村（西区）结构设计组和建筑设计组，结构组组长宋泽莉负责带他。

宋泽莉1959年从湖南大学土木建筑专

业毕业，是武钢设计院第一代设计人，后来成长为院里第一位结构设计女工程师、女高级工程师，爱岗敬业，经验丰富。钢花新村设计中的计算、制图全是手工完成，宋泽莉手把手教万维晓。宋泽莉还负责与建筑设计组全面对接，同时又是项目现场设计总协调人，带着万维晓扎根工地，验基槽，验钢筋，发现问题当场修改设计解决，每天忙得不计八小时内外。武钢分管领导称赞宋泽莉是“结构安全把关第一人”。

万维晓说，钢花新村住宅设计为他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基础，受益一生。以后，他还参加了钢都花园万套住宅工程等设计，获过许多奖项。

质量，奖惩分明

1985年3月，钢花新村西区工程动工（地下市政三通工程已先期进行）。武钢民建工程管理处以质量管理为中心，采取招标、议标方式，择优录用施工队伍。实行工期、质量奖罚办法，运用合同制管理工程。施工方式有武钢自营和武汉市城市综合开发总公司代建两种。116街坊由武钢自营，一部分由武钢民建公司按指令性计划施工，另一部分以招标、议标方式发包。其他街坊由武钢与武汉市城市综合开发总公司共同招标、议标，分别包给施工单位。由于精心组织，共节约建设资金494万元。

在所有施工合同中，均签订工期与质量奖罚条款并执行落地。钢花西区住宅工程仅用一年半就基本建成，比国家工期定额提前一年以上，工程质量良好。武钢兑现承包单位15万元奖金。

武钢派出代表作为总甲方，设立工地办公室，派驻现场人员，对“武汉城开代建工

程”间接管理，协调处理事宜，监督工程实施；对武钢自建工程直接安排、直接管理，发挥各方积极性、创造性。

在质量管理上建立健全质量检查网，一是不论哪家施工单位，没有专职质检机构和专业人员不准上场；未自检不予专检，不得进入下一工序。二是甲方监督实行重点抽查与大检查相结合，重点放在隐蔽工程和承重结构上，纠正了39个方面的上千个质量问题。三是组织观摩质量优良工程。四是严肃处理质量事故，对118街坊6号楼存在质量问题的两层楼分别拆除重建。五是把好交工验收关，先预检，处理完问题才能走验收程序。由此，钢花新村西区工程质量合格率达100%，优良率达78.7%。

钢花新村西区住房户型有6种，共6672套。每套住房均为独门独户、独厕独厨。住宅间距不小于1.1倍房屋高度，通风好，外形设计新颖大方。配置可谓齐全：纱门纱窗及吊扇钩、吊柜、壁柜、鞋柜、挂衣钩；管道煤气及瓷砖锅台、案板、碗柜；电视共用天线及各种家用电器暗装插座。卧室和客厅地坪、墙裙为彩色涂料；厨房、卫生间瓷砖墙裙，马赛克或水磨石地面；厕所内设座式马桶、玻璃钢浴缸、水箱等。这些，如今似乎都不值得一提，在40年前绝对高档。

钢花新村西区竣工两年之后，1988年11月下旬至年底，钢花新村东区第一期工程110、111、114计3个街坊相继开工。

此前，武钢民用建筑工程管理机构升级，成立武钢民用建筑工程指挥部，武钢副经理熊安芬任指挥长，下设1位第一副指挥长，4位副指挥长。机构包括综合计划组、



钢花新村东区竣工一角

设计管理组、预算审查组、质量监督站和钢花新村、白玉山、红钢城3个工程管理组。统一负责组织武钢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中的青山地区民用建筑工程建设。

武钢民用建筑工程指挥部极为重视钢花新村东区建设，经与有关部门商定，与武汉市工程质量监督站共同控制工程质量，为保证质量又增设了一道关卡。接着，第二、三期工程相继开工，包括108、109、112、113、115等5个街坊。1993年，115街坊竣工，标志钢花新村东区建设全面完成。

钢花新村公共建筑配套齐全，居民开门七件事，不出“钢花”都可以解办。各级市政道路宽阔平坦，水、电、气管设施线全部敷设于地下，地上天空明净整洁无遮无拦。绿化以游园为中心，辅之楼间小块绿地，以林荫道相连，园林小品和庭院灯柱点缀其间，呈现花园之美。

分房，打分张榜

在筹建钢花新村的同时，武钢有关部门提前修订完善原有的分房条例。1984年10月，武钢职代会讨论通过《武汉钢铁公司职

工住房分配条例》。12月24日，以钢房字〔1984〕605号文件颁发实行。

这个《条例》跟过去不同的是：按职工的职务、职称、级别、工龄等多项分数累计，按分数高低分房；对老红军、劳模、归侨、中高级知识分子等予以照顾；职工子女一律在本单位排队分房；男女双方可确定一方分房。

1986年，武钢房产公司遵照《条例》分配住房，其原则是解决无房户和住房拥挤户。程序为个人申请、组织审查、民主评议、张榜公布，经武钢职代会验收后再落实到住户，打分确定住房标准。

武钢职代会加强对分房的监督。各单位成立由职代会领导的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评议审查同级主管部门提出的分房方案，张榜公布，征求群众意见后再落实到人。

在分配钢花新村西区住宅时，武钢职代会生活福利委员会组织40多名职工代表和干部到各厂、处、室审查分配情况。还成立由职代会生活福利委员会和房产公司房产科等代表组成的住房分配接待办公室，处理职工来访来信事宜。这些举措保证了武钢历史上数量最大，涉及面最广的分房圆满完成。

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报道新华社消息，题为《六千新房如何分 武钢领导遇难题 两个半月见分晓 互敬互让没人怨——职工说：党员干部个个好样，实实在在看到了整党成果》。消息写道：“6月，他们决定把分配住房方案交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并把职工住房情况、分配方案和分配结果张榜公布。这样一来，想开后门的人没有门路，不符合分房条件的人也心悦诚服。”

消息中还讲述了分房过程中干群互敬



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一版报道“武钢分房”

互让的两个故事：一是大型轧钢厂精整车间党支部书记张天志，把预分到的一套两室一厅新房让了出来；二是电讯厂在分配住房楼层时决定采取抽签方式，却遭到职工反对，他们表示要把好楼层优先分给有困难的职工。

乔迁，集体帮忙

据《武钢年鉴（1987）》记载：“钢花新村西区住宅分配后，武钢共有12700户需要搬迁，其中搬进钢花新村西区的有6672户，旧房调整的有6028户，为武钢住宅搬迁史上的盛事。”

怎样办好万余户职工家庭乔迁这一大喜事？武钢提前部署，周密安排。1986年8月9日，武钢成立搬迁现场指挥组，房产公司经理为组长，公安处、交运公司、民建工程管理处等单位负责人任副组长。各二级单位也成立相应小组。



职工乔迁钢花新村

搬家涉及方方面面，指挥组多次召开会议，制订计划措施。钢花新村西区住户分期分批搬入，时间为9月中旬至10月中旬。如此明确时间规定，除了有序搬家以外，也是为了尽快腾退原住房二次分配，让拥挤户早日“宽松”。

指挥组划定每一个街坊的搬家路线，在进出口、拐弯处设置标志牌；对车辆的长宽也有具体限制，避免损坏设施；还提出了相应的纪律要求。指挥组各成员单位和二级单位上下联动，指挥调度和纠察人员在各街坊设岗，维持秩序、保证治安。

同年9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通讯《乔迁之喜》，反映武钢职工喜气洋洋搬进钢花新村西区。旅居美国旧金山的华侨伍振权先生看到后，从大洋彼岸写信给素不相识的武钢第一炼钢厂工人陶银堂，赋诗一首《武钢喜事多》祝贺他乔迁，诗中写道：“陶府银堂住钢花，高高兴兴颂光华。”陶银堂欣喜地回信答谢。

已退休的武钢二炼钢厂教授级高工彭胜堂回忆说，1984年他大学毕业来到武钢，四年后考上研究生，毕业后又回到厂里。1992年是工程师，任连铸车间技术组组长，分到钢花东区110街坊一栋6层高楼的5层一室半一厅。他去看新房，一口气上去，分外高兴。当时他儿子4岁，一家三口能拥有一套宽敞明亮的新房，都兴奋得睡不着觉。他选了一个吉日，厂里派车，几位同事扛的扛抬的抬，热热闹闹把不多的家具搬进了新家。

发展，扮靓老区

四十年砥砺，沧海化桑田，武汉每天都不一样，钢花新村周边也建起一片片新小区，包括武钢钢都花园职工住宅区和房地产商开发的钢洲花园、钢花南苑等。钢花新村住房也都实现货币化，职工出资买下自己的房子。

今天，钢花新村虽然逐渐褪去鲜亮花容，好在每个街坊的物业公司，每隔六七年即对小区搞一次维修改造，如地面刷黑、泥地硬化、植草种树、车位划定、健身设施更



工业路口的友谊大道高架桥和116街坊小高层

换、自来水管扩容、房屋外墙面防水涂刷等，让钢花新村整旧如新。

武青三千道在2000年更名为友谊大道。2023年底，那儿的钢花新村居民望见窗外升起一条高架友谊大道，有的居民因此而拆迁，告别“钢花”迁居新宅。

2020年7月，友谊大道快速路改造工程开工，全长约19公里，分为北、中、南三段（北段宏茂巷——三环线，中段武车路——宏茂巷，南段武车路——梅家山立交）建设。北段全长约9公里，采用高架桥加上辅道形式建设，约有5.3公里路段在青山区。北段工程需要征收青山区的房屋，在友谊大道东起工业五路、西至罗家港路沿线。其中，钢花新村从西到东有121街1栋、118街4栋、115街3栋、112街1栋，计9栋住宅楼被拆除。

北段工程于2023年12月30日通车。上下两层的友谊大道，直连天兴洲大桥和武汉火车站。

2018年，青山区生活区普及天然气。钢花新村114街坊内的武钢房产公司煤气输配所，一座5400立方米储量的煤气柜和附属设施被拆除。中国宝武武钢集团全资子公司——武汉山水雅苑置业有限公司竞得此地，2022年开发为集商品房、公租房、酒店于一体的山水雅苑方园，打造出“青山主城”优质住区。同时，青山区“三旧”改造113街坊（东）项目启动，居民房屋被征收，2025年3月开发为中交澄园小区。这两个现代化住宅小区落成，给钢花新村东区增添了都市宜居亮色。



恩施街“特色美食一条街”

恩施街是钢花新村东区的一条长街，115、114等8个街坊分置两侧，与友谊大道平行，从起点工业路走到终点工业四路约1.7公里。2021年，青山区和武钢携手将恩施街改造为“特色美食一条街”。

百余家餐饮店铺沿街摆开。游客能在这里尝到各地的吊锅、蒸菜、卤味、烧烤、水煮、油炸、麻辣烫等多种风味小吃。以锅炉、铁屋、钢管等为元素的抽象工业雕塑和建筑园林小品，让恩施街既保留了钢城记忆又呈现都市浪漫。恩施街烟火气息浓郁，每年引来客流量约700万人次，已成为武汉知名的风味美食“网红打卡地”和省级特色商业街。

四十载春秋重塑，钢花新村魅力犹存。

钟钢，武钢集团工会原副主席

用脚步丈量民情 以笔墨传递民意

◇ 朱淑敏

人物名片：朱淑敏，民进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民进江岸区工委主委，区政协常委、区侨联副主席，区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参政议政不能隔着玻璃看，不能坐在屋里想，更不能材料堆里转。只有脚下沾泥，建言才有分量；心中有民，建议才有温度。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我牢记心中。这些年，我为民奔波走了很多路，每一条路上，我也遇到很多需要我的人……

填平“数字鸿沟”，守护银发从容

2021年3月，政务中心大厅，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盯着闪烁的手机屏幕茫然无

助，因不会扫码、不会线上办理而四处求助。我主动上前交流，帮他解决问题。

针对互联网时代老年人操作智能手机困难的现象，我执笔撰写了《关于在政务中心、医院增设服务窗口，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保障的建议》，并在武汉电视台《政协论坛》第37期《让老年人跟上互联网》节目中谈到：让老年人跟上互联网时代的步伐，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文明体现。通过技术创新降低使用门槛，通过人文关怀填补情感与服务空白，方能真正实现“数字包容”，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在信息化时代拥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一纸建言，推动一城改变。随着老年人专属窗口落地开设，绿色通道畅行无阻，传统服务温情留存，曾经寸步难行的日常，如今变得从容顺畅。

从“补网”到“建规”，守护孩童头顶的安全

2022年5月，丹亭懿府幼儿园临近竣工开园，我在巡查中发现，操场上相邻居民楼抛下的酒瓶、烟头及杂物随处可见。二七街道华发外滩首府幼儿园问题更大，孩子上学放学进出通道与居民楼共墙，一旦发生高空坠物，后果不堪设想。调研中得知园方早就向区教育局提出申请，打算加装防护网，但因部分业主担心遮光、影响美观坚决反对而搁置。

摸清情况后，我迅速执笔撰写《关于排查解除幼儿园高空抛物安全隐患的建议》，提交后区政协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联动丹水池街道、二七街道政协联络委，召集社区、职能部门、物业、业委会、居民及园方代表进行实地踏勘，一线协商。会后，为化解住户顾虑，我多次陪同园方优化施工方案，降低网架高度、搭配绿植装饰，最大限度地确保居民居住环境不受影响。

业主投诉阻挠时，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转化了大多数，遇到个别极端的投诉人，很多人劝我算了，但我却异常坚定。在财政经费紧张的当下，区教育局主动出资为孩子做安防改造，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不能因为极少数人的反对，就视孩子们的安危于不顾，让我们的幼儿园上空每天悬着一把刀。

就这样，我既当设计师，又做调解员，每天接打无数个电话力保校园平安。我还上网查询类似案例，发现问题较为普遍。为此我走进区规划局咨询，了解到根源在于目前规划审批中，缺少校舍与住宅安全间距规范。

随即，我提交提案《应重视学校与居民



走进校园

楼紧密相连或共墙导致的高空抛物安全隐患》，建议尽快完善地方细则，将安全间距设为新建校园审批硬性前置，从源头补齐规划漏洞；同时对已有隐患做出加装防护网、安装360度无死角监控，对周边居民开展安全普法教育等补救措施。

在《政协论坛》第90期《警惕高空抛物》节目中，我发出呼吁：“居民朋友能够将心比心，哪怕目前园里没有您的孩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样为了别人的孩子舍小我为大家，支持这项防护措施落地。”《警惕高空抛物》入选市政协“一线协商 共同缔造”案例汇编成果。

托住稚嫩身躯，托起民生底气

“孩子才一岁半，送私立托育一个月五千多，比我工资还高。”这是2022年7月在调研专题座谈会上，一位年轻妈妈的讲述。虽然三孩政策全面落地，但“托不起”“托不好”仍是寻常百姓之痛。

为此，我走访辖区托育机构、幼儿园、社区家庭，倾听年轻父母的焦虑，触摸行业的冷暖。可调研越深，我心越沉。武汉千人托位远低于“十四五”目标，公办普惠托育占比不足，“一位难求”让家长望园兴叹；行业标准参差不齐，监管权责模糊，供需错配将无数家庭挡在门外。

决不能让父母在孩子和工作之间二选一。摸清情况后，我执笔提交《多措并举推进我市0至3岁托育服务发展的建议》，建言强化政府主导，让建设、服务、收费有章可循；推进托幼一体化，盘活闲置校舍，扩容普惠托位；优化社区、企事业单位托育布局，让“家门口的托育”触手可及；创新育儿补贴直达家庭，让养育成本降下来；推行全程可视化监管，让家长放心托付；完善育婴人才培养，让育婴队伍专业化水平提升。

做客武汉电视台《政协论坛》第99期《如何完善生育配套措施》专题访谈时，我说：“每一个小家庭的后顾之忧，都是大民生的必答题。我们要让年轻父母敢生、愿养、托得安心。”那间托育室里，托住的不只是稚嫩身躯，也是年轻父母重新出发的勇气。



参加《政协论坛》

叫停“表演式赛课”，为教育“去功利”

“一堂国家级赛课要准备几个月，正常教学都顾不上。”2024年一位教师的话让我陷入沉思。现实中，不少教师为争夺赛课名次，反复磨课、跨班试讲，严重打乱日常教学节奏；赛课评价重形式、轻实效，过度追求课堂观赏性；加之赛课成绩与职称评聘深度绑定，彻底催生了教育功利化风气。三尺讲台本该潜心传道授业，却沦为竞技场，“表演式赛课”的乱象已让一线教师疲于奔命，学生沦为课堂“道具”，育人者的初心在名利追逐中逐渐褪色。

“再不改，毁的是老师，误的是孩子。”2024年，我提交《关于取消表演式赛课，切实为基层教师减负的建议》，呼吁彻底摒弃过度包装的表演式赛课，建立以日常教学实效、学生转化率为核心的评价体系，让教师回归课堂本位、深耕教书育人本职。

同时，我还结合教师们的反映，提交《关于取消教育界“名校长”“名师”系列评选助推教育去功利化的建议》，指出当前各类评选已被异化为校长们包装履历、追逐头衔的工具，加剧了基层教育的不公，呼吁教育褪去功利、回归纯粹。

两份建言均被民进中央、省委会采纳，第一篇还获评“湖北省民进地市级组织优秀参政成果”。

以“四方共治”堵住奶茶监管真空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奶茶”导致青少年慢病低龄化问题频上热搜，深深牵动着我的心。

现下奶茶已成为青少年高频消费品，

但市面茶饮普遍存在添加糖、反式脂肪酸、钠盐超标等问题，所谓“无糖”“半糖”饮品，也都暗藏大量隐性糖浆。长期饮用会导致肥胖、脂肪肝、青少年糖尿病等问题，慢病低龄化趋势凸显。

走访调研后，我发现茶饮行业缺乏统一生产标准，无强制营养标签公示制度，监管存在明显空白。叠加网络平台低价营销持续诱导非理性消费，行业乱象难以根治。

为守护青少年成长，我结合临床数据与市场抽检结果，摒弃碎片化整治思路，创新构建政府立规、税收调控、企业革新、全民科普的“四方共治”路径，撰写的《以“四方共治”堵住奶茶市场监管真空 守护群众健康》建议，被民进中央、省政协采纳。

在大家的持续推动下，现制茶饮国标出台落地，全面推行营养成分强制公示，探索高糖饮品健康调节税，督促品牌建立原料全链条溯源体系，同时将膳食健康科普纳入中小学课程，从生产、监管、消费全链条筑牢青少年健康防线。

破解 AI 人才断层，疏通产业“五大堵点”

2025 年，很多 AI 企业抱怨“用工难”，究其原因国内高校教学偏重理论研究，工程实操实训薄弱，应届毕业生入职后，普遍需要 8 至 12 个月二次培训才能适配岗位，跨技术、跨产业的复合型 AI 人才出现大面积断层。

为此，我深入高校、科创园区开展实地调研。精准梳理出了产业发展的五大堵点：政校企研考核导向不一，长期合作机制



座谈会上发言

缺失；公共高端算力资源紧张，中小企业上机排队漫长；行业数据相互割裂形成信息孤岛，众多 AI 项目因数据不足暂缓落地；扶持政策分散、申报繁琐，早期科创项目面临资金断档；优质资源过度集中龙头企业，中小科创企业发展空间受限。

为彻底打通产教融合壁垒、补齐 AI 人才短板，我撰写提交《关于破解 AI 人才培养与产业协同“五大堵点”的建议》，提出金字塔分层育才、共建共享实验室、普惠算力数据、简化政策审批、龙头带动小微共生的系统性方案。建言获民进中央采纳，全面覆盖中小学 AI 通识普及到高端工程师定向培育全链条，为科创产业前瞻布局蓄力赋能。

这道缺口，我看在眼里，填在笔下，为的是让每一个孩子“学以致用”，让所有企业“有才可用”。

为侨商挡住“汇率之刀”

“接一单亏一单，不接单等死，接了单找死。”当一位在汉经营二十年的侨商红着眼眶说出这句话时，我的心猛地揪紧了。

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快速走强，年内累计升值约 2.6%。以年出口收汇 1000 万美元的中小侨企为例，单次汇兑损失高达 182.2 万元，足以吞噬企业全年过半利润。走访中我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事：订单被东南亚低价抢走，账期越拖越长，银行保证金一涨再涨，而企业却连最基本的汇率避险工具都“看不懂、不敢用、用不起”——全国 87% 的中小微外贸企业，仍在“裸奔经营”。

侨商们漂洋过海回乡投资，图的不过是一份踏实。我连夜整理调研笔记，向民进中央提交了《关于破解侨资企业“两头承压”困境、稳定外贸基本盘的建议》，呼吁建立侨企汇率风险动态监测预警机制，推动金融机构推出普惠化、简易化避险工具，搭建政企常态化对接平台。

一纸建言，承载着无数侨商背井离乡的坚守与期盼。我只愿，那些漂洋过海归来的游子，不再被汇率的浪涛打得遍体鳞伤。

2026 年 6 月 2 日下午，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赴民进湖北大学委员会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我被选为六位基层代表之一作了专题汇报。

2025 年获评“民进武汉市委突出贡献个人”，撰写的 18 篇社情民意被省、市政协或民进、统战部门采纳，6 篇被民进中央采纳，其中《关于“十五五”时期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打造文旅发展新场景的研究报告》在市政协常委协商会上作为发言材料，推动相关政策完善。

连续四年，每年都有一篇调研报告入选区“两会”大会交流发言，五次作为特邀嘉宾做客《政协论坛》。先后荣获“全国教育科研先进个人”“湖北民进 70 年双岗建功优秀会员”“民进武汉市委先进个人”“江岸区首届具有影响力统战之星”等 65 项表



德塔森特（武汉）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送来锦旗

彰，连续五年获评“江岸区优秀政协委员”及“优秀提案”。

办公室里企业赠送的锦旗是对我“躬身为民”最朴实的褒奖，双岗建功事迹在多家主流媒体刊载。一路走来，无论在何岗位，我都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脚下的路还在延伸，耳边的民声始终牵挂。往后我依旧会迈开脚步走一线，拿起笔杆话民生，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件记在心里、落到实处，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当好百姓身边靠谱的代言人。

一湖清水入画来

——赤壁陆水湖“大水缸”保护亲历记

◇ 李满林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5 周年华诞，我想起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领导人亲自批准修建的三峡试验坝，以及由此诞生的赤壁人民的“大水缸”——陆水湖。这座试验坝为大国重器探路，与今天正在推进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一脉相承，镌刻着党领导人民治水兴水的奋斗足迹。

回望当年守护陆水湖、整治饮用水源地环境的岁月，我深深感到：保护好“大水缸”，是赤壁市委、市政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一项德政工程。重拾这段亲历记忆，既是对那段攻坚岁月的致敬，更是对党百年来利民、为民、福民情怀的生动见证。

“千岛湖”之殇，母亲湖在哭泣

烟波浩渺的陆水湖，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一碧万顷。湖中岛屿星罗棋布，岸芷汀兰郁郁葱葱，无愧“千岛湖”之雅，堪称大美赤壁一张灵动的名片。

陆水枢纽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经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领导人批准，于 1958 年开工兴建的三峡试验坝，可谓大国重器——三峡大坝的“探路者”。由此工程孕育而生的陆水湖，是赤壁人民的母亲湖，集饮水、航运、发电、灌溉、防洪于一体，更是赤壁城区近 30 万人口的唯一饮用水源，



时任赤壁市副市长李满林在陆水湖科学养殖与水环境保护咨询报告会上讲话

是我们心头最珍视的那口“大水缸”。

然而2010年之前，这口“大水缸”有些区域曾满目疮痍、垃圾横流。湖内有大型机械挖砂船6只、运沙船12条，有时就在供水公司取水口附近肆意开采。1967年水库建成以来沉积了40多年的泥沙，被搅了个底朝天。挖砂船边挖边洗，泥沙通过传输带送进船舱，再拉上岸出售利益丰厚，水质却备受污染。

同时，湖内拦汉养殖面积达22400多亩，网箱养殖500多个；以博海湾渔馆为代表的坝上湖边餐馆数10家，大多污水直排；蒲纺医院、大昇印染等单位、企业处理不到位的废水也排入湖中。更不可控的是，上游通城、崇阳的污水污物顺流而下，囤积于此。枯水期时，赤藻、蓝藻频发。

我至今还清晰记得，2009年冬季的一天晚上10点多，蒲纺一位居民打电话到政府办公室，说烧开水腥味、异味严重得难以下咽。我闻讯连夜组织供水、环保、卫生防疫的同志赶到现场处置，一直忙到凌晨。

据当年环保部门监测，有的水域遇枯水期赤藻、蓝藻泛滥，水质严重恶化。

陆水湖的水质问题，一直是市民心头之痛，是人大代表不断呼吁的民生焦点，人们甚至把赤壁市的癌症发病率与之联系起来。

其实，陆水湖也连续整治了十多年。但由于多种原因，拦汉养殖面积越来越大，网箱越来越多，挖砂船从无到有，采砂距离由远及近，沿湖餐馆由少到多，到坝上吃鱼甚至成了一种“时尚”。利益驱使之下，屡治屡反弹，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市民意见很大。

立下“善”字诀，向痼疾宣战

面对这一严峻状况，赤壁市委、市政府抓住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契机，倾听人大代表和百姓呼声，把整治陆水湖环境作为2009年政府十件实事之一。

2009年6月，按照市政府分工，我作为副市长分管工业、招商引资、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等工作。时任市长熊征宇同志特意叮嘱我：“满林同志，陆水湖环境综合整治，保护‘大水缸’，你要作为重中之重来抓。”

我把组织交给我的这份重任，看作既是组织的信任，也是我们做善事的机会，更是三十万市民的期盼。同时，我也深知这副担子的艰辛，挖砂是暴利，拦汉及网箱养殖涉及面广、关系复杂，这是整治了十多年的陆水湖啊！

我内心五味杂陈，但深深明白这不仅是一项行政任务。我也是一位长饮陆水湖水的居民，更是具体分管全市环境保护的副市长，理应把城区及周边30万人喝上放心水，保护“大水缸”，当做一项义不容辞的职责与使命。

我经常与同事和群众说，净化陆水湖水质，是行善积德的好事，大家换位思考，都有责任、有愿望拥有一湖清水。同时，对这些船主与拦汉养殖、网箱养殖的业主，要依规测算，给予补偿，人性化操作，疏堵结合。

在我内心里，不论多少干扰与说情，整治陆水湖这口“大水缸”的决心，一定要毫不动摇！我常常告诫自己：在这个岗位上，做好这一关乎千家万户的大善事，就对得起脚下这片土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风雨夜归人，较量与温情并存

然而，要破除多年形成的利益链条，谈何容易？出工不出力的部门有之，怕得罪人的干部有之，看热闹、说风凉话的领导也有之。被整治的对象观望攀比、串联上访、托人说情，不一而足。

2010年6月17日，有人组织部分拦汉养殖户，到市政府大门下跪请愿，发视频到网上传播；也有挖砂船主到我住所楼下“说情讲理”，言语间不乏威胁与恐吓……

面对这些，我没有退缩。2009年8月27日，我在市人大七届三次常委会例会上，代表市政府就陆水湖环境综合整治作了郑重而坚定的表态。那一刻，我不仅是在代表政府表态，更是在为自己内心的那份良知立誓：这件事，再难，我也要当一件实实在在的善事，做到底，做成它！

我坚信，只要用工程化、项目化的思维方式，系统谋划，有的放矢，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难关。我告诉自己：这不是在得罪人，这是在救赎这湖水，是在为赤壁人民积福。

如何打好陆水湖大保护攻坚战？

首先，争取领导重视。我多次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市委书记王铭德明确

指示：“态度要坚决，工作要细致，目标要达到。”市委还安排人大、政协分管领导，一同参与整治陆水湖环境。

市委副书记、市长熊征宇亲力亲为，他对我的建议，照单全收、大力支持。我们还通过做方案、写报告，请书记、市长下湖检查、参加会议督办等方式，表明市委、市政府的坚强决心。领导们的魄力与担当，让我心里更有底气：这件造福百姓的善事，有时、有地利，更有了“人和”。

其次，专班尽职尽责。当时的陆水湖整治专班，由之前的专班专人、专门办公室、专项经费，改为松散型的无专门办公室、无专门经费，但有责任有目标任务的专班。先后联系我工作的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余蒲英、宋锦来，尽职尽责，上传下达，做了大量综合协调工作；陆管局副局长卢三奎、环保局副局长胡修富等同志，夜以继日，恪尽职守。同时，市环保局、水利局等部门，起早摸黑，合力攻坚。我们形成了共识：辛苦一时，造福一城百姓。

其三，加强舆论引导。我们联系赤壁电视台、赤壁广播电台、赤壁网及《今日赤壁》开辟专栏、宣传政策，反映动态，表明决心。采用连续报道方式，形成强大舆论攻势，让全市人民了解整治进度，让被整治对象感到压力，这次不是一阵风，而是彻底根治，是为大家的“大水缸”清污。

其四，密集督办推动。2009年6月至2010年11月，仅一年多时间，先后召开专题会、碰头会、督办会、座谈会等上百次，督办进度简报发了100多期。这里面涉及300多户业主，利益诉求各异。整治初期，我带领专班同志一道，经常与整治对象对话到下午一两点才能吃上午饭，又累又饿，当年硬是饿出了胃病。



赤壁市陆水湖科学养鱼与水环境保护咨询报告会会议现场

但每当看到那些原本怒气冲冲的养殖户，在听完解释后逐渐平静下来，或看到他们最终答应签下拆除协议时，我内心就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欣慰：又化解了一分怨气，又接近了一分清水，虽苦犹乐。因为我知道，这世上还有什么“实事”，比让三十万人喝上干净水更实在、更紧迫呢？

五大经典场景，见证破冰时刻

整治中的几个经典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场景一：走出去，取回“他山之石”。有一次，我回老家湖南岳阳县毛田镇，留心了解到铁山水库饮用水源地保护办法值得学习借鉴。2010年4月24日，组织相关部门、乡镇、村和专班同志30多人，我带队到岳阳市水库管理局去学习，受到热情接待。我们参观学习后，深受启发，既羡慕又心急，也更坚定了信心。回来的路上，我对大家说：“岳阳人能做到，我们赤壁人为什么不能做

到？为了我们的‘大水缸’，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

场景二：请进来，用科学击碎谎言。针对有的拦汉养殖户断章取义，称省水产科研所所长汪亮有文章说“养鱼可净化水质”，政府不应取缔拦网养殖，我与市环保局负责人一起去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请教，并把汪亮所长等专家请到赤壁来。

2010年6月8日，省水产科学研究所所长汪亮、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原院长谢从新、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李仁辉等三位专家，如约请到陆水湖

办事处会议室。

会场悬挂“赤壁市陆水湖科学养鱼与水环境保护咨询报告会”横幅。三位专家现场与50多位拦汉养殖户代表，就陆水湖内拦汉养殖等问题，进行了讲解并答疑。

我主持这次专家咨询报告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阐明保护陆水湖的必要性及市委、市政府的态度与决心。我说：“各位乡亲，政府不是要断大家的生路，而是要为三十万人保命。补偿款虽不多，但是按相关规定测算的，你们的理解和配合，就是为赤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会后，大多数养殖户的思想有了转变。

场景三：拉网式清湖，雷霆之势荡污浊。当百分之八十的拦汉养殖自行拆除后，仍有少数顶着不拆。我夜不能寐，反复琢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次半夜醒来，突然想到：必须来一次彻底的、拉网式的清理大行动！

我向熊征宇市长汇报建议：“书记、市长不宜当指挥长，不能把领导推到风口浪

尖。我这个副市长分量轻了点，具体操办、协调落实，则是责无旁贷。”我建议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总指挥，相关市领导负责宣传、维稳、卫生医疗、应急安全等。熊征宇市长听后，赞许我考虑周全。并说：你们做好方案，召开动员会时，我到会作强调，你具体作安排。

2010年7月19日，烈日当空。几十条公务船搭载300多名干部干警，浩浩荡荡开赴湖面，从官塘驿镇的双丘村湖汊、官塘林场、蒲圻办事处，到陆水湖办事处沿线各个湖汊进行清理。行动安全有序，圆满完成。从此，盘踞多年的拦汉养殖与网箱养殖彻底清除。挖砂船有的切割，有的卖到外地了。

场景四：坝上餐馆，领导带头“不捧场”，由其自生自灭。我在市四大家联席会上多次呼吁：“请各位领导带头，不到坝上就餐。”书记、市长主动不去，市接待办和全市机关单位纷纷响应。同时，环保局安排专车流动巡查，发放环境保护宣传单，并在坝上路路口拦车劝返。加上餐馆老板自身认识提高，最终使这些餐馆自行停业。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办实事，光靠硬堵不行，更要靠巧疏，靠带动。

立法保护，为“大水缸”铸就“护身符”

我从市政府转岗到市委宣传部、市政协工作期间，一直关注与呼吁陆水湖的保护。2018年初，在市政协九届二次全会前，我安排政协提案委主任郑元英写一份关于陆水湖环境保护的议政发言材料。我修改后，请政协常委程东林同志在大会上做了议政



如今的陆水湖风景区

发言。他即兴发挥，讲的很好，得到了与会人员共鸣和领导重视。

随后，在咸宁市政协全会上，我又与程东林同志商量，就保护陆水流域环境，提交建议立法的提案。该提案引起咸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2021年10月1日正式实施《咸宁市陆水流域保护条例》，为陆水湖水质可持续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与遵循。

那一刻，我长舒一口气。这口“大水缸”，终于有了法律的长效保护，我们当年的“善举”，终于从制度上扎下了根。

据不完全统计，当年赤壁市政府共投入陆水湖环境综合整治资金达960多万元，包括养殖、挖砂船切割补偿，蒲圻至城区一带沿湖截污管道建设等。这在当时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是十分难得的。

如今，回想起那段岁月，我仍是心潮澎湃。能亲历并参与组织指挥为赤壁百姓留下的“一湖清水”，能为子孙后代守住这口“大水缸”，是此生莫大的荣幸与欣慰！

李满林，赤壁市政协原主席，现任赤壁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

向光而行：轮椅上的履职之路

◇ 董 明（口述） 银 华（整理）

人物名片：董明，市政协委员，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武汉开放大学）教师。

大家经常看到的我，可能总是带着笑容，坐在轮椅上，出现在某个课堂、某个会场，或某次志愿服务的现场。很多人觉得我很坚强，但其实我只是学会了如何与命运好好相处，把别人眼中的苦难慢慢消化成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故事不是什么英雄故事，说到底，就是一个普通女孩在轮椅上不断成长，学着去奉献，也学着在每一次跌倒后重新找到站起来的理由。

苦难淬炼出学习信仰

九岁那年，在一次跳水比赛中，为了避免让队友，我的颈椎重重地砸了下去，身体从脖子以下全部瘫痪。没有知觉、没有动作，连开口说话的能力都一并失去了，浑身上下唯一能动的，就是眼睛。那一瞬间，我的人生就像被按下暂停键。

从一个在跳台上飞翔的小小身影，变成了只能躺在ICU病床上、靠呼吸机维持

生命的病人，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体会这种绝望。我曾经想过放弃，是父母跪在我的病床前，求我活下去。那一刻，我突然领悟到什么是责任，我的生命不仅仅属于我自己，它还连着父母的全部希望。

为了活下去，为了给父母一个念想，也为了给自己找一个精神支柱，我选择了学习。ICU里很安静，只有仪器滴滴答答的声音。我看着医生手里的病历、杂志，用眼睛死死地盯着上面的字，暗示我的父母——我想看书。可他们太“笨”了，我足足暗示了三个月，他们才明白我的意思。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病床上的自学，没有老师，没有课本，有的只是一本一本借来的书。手不能握笔，我就在心里一笔一划地默写；口不能诵读，我就在心里一字一句地默念。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漫长的十年里，我学完了小学到高中的全部课程，还自学了英语和日语。对当时的我来说，学习是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是我唯一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的方式。

后来，父母借钱给我买了一台二手电脑，我用大臂带动小指的第二关节，再配合

嘴唇，一下一下地敲打键盘。靠着这样的方式，我开始在网上写稿，把稿费攒下来，资助农村的失学儿童。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我还能为社会做点事，那就努力做一点。

在受伤后的第七年，一件连医生都解释不了的事情发生了——我居然能开口说话了！核磁共振显示，我的语言神经和肢体神经还是断裂的状态，可我就是能说话了。我把这叫做“奇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奇迹，是我十年咬牙坚持换来的奇迹。这也成了我后来在思政课上最爱跟学生讲的一个道理：奇迹并不遥远，只要你不放弃自己。

有人问我，学习对我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想说，是知识，但更是知识带给我的那份底气和希望。它让我知道，就算身体被禁锢在这张病床、这辆轮椅上，我的心灵还是自由的。我依然可以去感知世界、去思考、去创造价值。我常对自己说一句话，后来也成了座右铭：我微笑不代表我没有痛苦，只是我不愿冷落幸福。

“行走的思政课”

2007年，我终于走进了魂牵梦绕的校园，成为国家开放大学的一名学生。后来，我考取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又攻读了硕士学业，最终成为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的一名思政课教师。从躺在ICU里的被救助者，到站在大学讲台上的教育工作者，这条路我走了整整十几年。选择当老师，是因为我心中始终装着一份感恩——感恩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感恩那么多人的托举和善意，让我能够从生死边缘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光亮里。

我想把这份关爱转化为一种力量，在讲台上把党的关怀和时代的故事讲给更多年



参加 2025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

轻人听，于是在学校里打造了一门“行走的思政课”。我们带着学生们走进乡村，去关爱留守儿童；走进社区，去服务孤寡老人；走进助残一线，去感知那些被命运考验的人们身上顽强生长的力量。

有一次，一个学生跟着我走访一户困难家庭，回来之后跟我说：董老师，我以前觉得自己生活太平淡了，没什么可抱怨的，但今天我才知道，原来自己拥有那么多。真正的思政教育，从来不是让学生背下多少理论，而是让他们在真实的触碰中去感知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然后发自内心地明白自己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思政课不能只停留在教室里、书本上，它应该走进社会里，走到时代中。

除了上课，我还带着学生们参加过十多次国际赛事的志愿服务——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伦敦奥运会、北京冬残奥会、杭州亚残运会……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我再次当选火炬手，在“追梦之路”的主题下传递火炬；2023年杭州亚残运会，我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邀请，担任直播解说嘉宾和出镜报道记者。

那段时间，我每天工作近18个小时，

坐着轮椅辗转各个场馆，用小指关节一下一下敲键盘写稿，常常忙到深夜。作为主媒体中心唯一坐轮椅的媒体人，我成了其他记者采访的对象。每次我都自豪地告诉他们：我来自千湖之省湖北，来自英雄城市武汉，热干面和鸭脖是我最爱的家乡味道。我想用我的视角，向世界展示中国残疾人的风采，讲述真实而有温度的中国故事。

在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党委的高度重视下，我们搭建了三大平台——董明班主任工作室、董明心理咨询室和董明爱心志愿者团队。其中，爱心志愿者团队聚焦于带领学生以专业所长服务城市发展、回应人民需要。16年来，团队累计培养5万余名青年志愿者，先后帮助全国8000多位困难青少年，陪伴800多个绝望的生命走出阴霾。我们深入过汶川地震灾区，也坚守过武汉抗疫一线，还持续关爱农村留守儿童5000余人。

从“被志愿者帮助的人”到“带着5万人做志愿者的人”，最难的是做到始终相信自己。在最开始的时候，曾有一个志愿者当面对我说：“一个坐轮椅的人能做什么？别给我们添麻烦了。”这使得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当时来了几位外国游客，全场的志愿者里只有我会日语，我强忍着眼泪，用流利的日语帮他们解决了问题。那一刻，所有人都对我刮目相看。后来，那个男生主动向我道了歉，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也成了一名优秀的志愿者。我想说的是，不要轻易用自己的偏见去定义别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光芒。

从轮椅上发出“百姓声音”

我深知，能走上政协这个平台、担任武汉市政协委员，是因为我身上扛着许多人的

期待——残疾人群体、教师群体、青年群体、女性群体……每一个身份的背后，都是一群需要被看见、被听见的人。市政协给了我一个特别的课堂，让我一边学习、一边成长、一边把学到的东西变成推动改变的力量。

写好提案，最根本的还是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大兴调查研究，而我的调研路径，恰好与自己的多重身份相关。首先，作为青年群体、残疾群体、女性群体和教师群体的一分子，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普通教师和基层群众，他们的真实诉求就是最好的调研素材。其次，我长期带领志愿服务团队深入一线，在每一次助残、助老、助学的实践中，都能看到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底卡在哪里。第三，我经常受邀到企业、机关单位去讲课，这些场合让我能听到不同行业、不同层级的声音，看到社会治理的各个切面。正是这些来自不同渠道的观察和积累，让我的每一份提案都有了扎实的调研基础。

这些年，我围绕自己工作所及的领域，先后提交了多份提案，涉及急救救护教育、职业教育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等多个方面。每一份提案的背后，都是大量的走访调研和日复一日的观察思考，是无数个日夜里我对身边人、身边事的用心记录。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有这么几件：

2022年，我和其他委员联名提交《关于推进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意见》。我所在的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是一所高职院校，我深切感受到职业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但产教融合不够深入、职业本科院校建设滞后等问题依然客观存在。市教育局在答复中明确支持市属高职院校申办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将我校和武汉城市职业学院纳入省级“双高”立项建设名单；市经信局大

力推进“科技副总”项目，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这些实实在在的进展，让我看到了武汉职业教育正在迎来发展的春天。

2025年，我独立提交《关于进一步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建议》。我所在的学校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包括西藏班、新疆班的孩子。在日常教学中，我看到各民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动人场景，也意识到这项工作需要更加系统化地推进，因此从教育、文化、社会治理、经济四个维度提出了建议。市民宗委在答复中详细介绍了武汉的实践：全市1431个社区为各族群众提供20余项公共服务，每年举办1000余场次各民族联谊活动；市教育局确定每年9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月”，市属高校已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必修课；市发改委介绍对口援疆工作，34所武汉优质学校与博乐市35所学校结对帮扶。这些系统性的工作推进，让我更加坚定了持续推动这项工作的信心。

2026年，我提交《关于深化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赋能健康武汉发展的建议》。这份提案，是我心里最柔软也最沉重的一块。我是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2020年疫情期间曾连续106天参与心理援助热线服务。那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心理健康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支撑，因此我从顶层设计、服务网络、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系统性建议。这份提案得到市卫健委、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等八个部门的联合办理：团市委推动12355青少年服务台2025年完成全省并线整合；市教育局建立11个部门联



董明爱心志愿者团队

动的学生心理危机防范工作机制；市民政局依托165个街道未保站建成基层心理服务阵地。看到这些实实在在的进展，我感受到武汉在心理健康服务领域正在织就一张越来越密的保护网。

回望这些年提交的每一份提案，从纸面到落实，中间都有无数人的努力和付出。每一次调研、每一份提案、每一次协商，都是在为那些需要的人发声。坐在轮椅上，我的脚步无法到达每个角落，但我用心去倾听、用脑去思考、用笔去表达。这个时代给了我重生的机会，政协平台给了我发声的舞台，我能做的，就是不辜负每一份信任。在接下来的履职中，我还是会继续关注残疾人的保障和发展，给他们——也是给我们——更多参与社会、实现价值的机会。

如果说这些年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那就是：生命里的酸甜苦辣，都那么真实地属于我们，痛苦和甜蜜都是滋养成长的养分。我常对自己说，内心何其温柔，才能撑起这百变的人生。只要心中有爱，处处皆是春暖花开。

做黄陂基层法治的守护者

◇ 胡生浩

人物名片：胡生浩，黄陂区政协第五、六届委员，湖北观筑（黄陂）律师事务所主任。

法治不应只是挂在大楼里的标语，更要落实到老百姓身边每一件具体的事上。自2013年执业至今，十余年间我从未离开过黄陂，一直扎根这片土地从事法律服务工作。基层群众需要法律帮助，基层法治建设需要有人沉下去。我愿做黄陂基层法治的守护者，让法治之灯照亮这片土地。

一本手册，一方阵地

我刚入行从事法律工作那几年，接了不少案子，也慢慢接触到基层治理中的实际问

题。2019年前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正在推进，权力往基层下沉，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我注意到一些新的问题：赋权虽然下放了，可基层执法人员面对新职能时，常常不知道依据哪条法律、走什么程序，心里没底，手上没谱。

我当时就想，能不能整理一本工具书，把相关的法律法规汇编起来，让大家查着方便、用着安心。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逐条梳理涉及街道赋权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法规，编成《武汉市黄陂区街道赋权综合行政执法法律法规汇编》，自费印制100多本，无偿捐给区司法局，分发到各街乡执法人员手上。随后，我还在王家河街道等好几个单位进行专题培训，围绕执法程序、法律依据、风险防控逐项讲解，累计培训执法骨干百余

人次，期待推动基层执法队伍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提升。

法律服务的根要往下扎，光靠一个人跑断腿远远不够。2022年，我牵头创办湖北观筑（黄陂）律师事务所。当时想法很简单，黄陂缺高端法律服务，不能什么事都让老百姓往市中心跑。律所成立后，我们联合区市场监管局设立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入驻汉口北商标品牌纠纷调解室，承接了江岸法院151件知识产权诉前调解案件，并参与武汉市首例“行政调解+司法确认”知识产权纠纷化解。这样一来，企业在家门口就能解决纠纷，黄陂营商环境也实实在在得到了优化。这件事后来被《人民日报》、中新网、《湖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在基层群众自治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探索。黄陂区王家河街冯桥村胡家墩村民小组召开议事会，我们团队提供全程律师见证服务，对村民资格确认、代表选举、重大事项表决这些关键环节进行法律监督。这是黄陂区第一次引入律师见证来规范村民小组议事，目的就是让村民自治真正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从业这些年来，我始终保持零违纪记录，并获评武汉市“百名优秀村（居）法律顾问”。这些荣誉让我时刻提醒自己，做法律工作，首先自己得行得正、站得直。但基层的事，光靠一个律师其实做不完。在服务过程中我慢慢意识到，要想让法治真正留下来，不能只停留在“帮人打官司”，更要进一步“帮人懂法用法”，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乡村振兴。



对胡家墩村民小组议事会提供全程律师见证服务

一场培训，一方法治

“乡村振兴，法治先行”，这句话不是口号，是实实在在的需求。我在基层跑得多了，发现一个普遍问题：很多村干部和群众不是不想依法办事，是真的不懂法、不会用。村里遇到土地承包、合同签订、“三资”管理这些问题，常常凭老经验拍脑袋，结果事后出纠纷、吃大亏。

作为第七届武汉市律师协会乡村振兴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我觉得必须做点什么。随后，我们组建了“法律明白人宣讲团”，先后在黄陂区横店、长轩岭、木兰乡等8个街乡开展20多场专题培训，精准培育基层治理骨干497名，累计覆盖千余人次。我们的培训不讲大道理，就是用真实的案例讲土地承包合同怎么写才规范、“三资”管理怎么防风险、邻里纠纷怎么依法调解。以案释法、现场答疑，村干部都说听得懂、用得上。

农村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是乡村振兴的家底，也是问题最集中的领

域。我牵头开展了农村集体合同专项审查，带着团队逐份梳理合同的程序瑕疵、内容漏洞和履约风险，推动集体资产交易走上规范化轨道。为了让基层干部和“法律明白人”有章可循，我组织编撰《农村“三资”管理合同法律明白人实操手册》，把法律条文转化成基层干部看得懂、用得上的操作指引，免费发放。不少村干部跟我说，这本小册子就是他们管“三资”的工具书，遇到问题先翻一翻，心里有数。

这几年，我还带着专委会推进“四个一”重点工作——组建一支专业宣讲队伍、编写一本普法宣传册、举办一场主题论坛、组织一轮专题调研。我带队去过福建泉州、湖北罗田燕儿谷、武汉农村产权交易所调研，学习先进地区法治赋能乡村振兴的经验，形成的调研成果在省、市律师行业平台推广。

除了专委会的工作，我还加入黄陂区“同心律师团”和职工法律援助队伍，常态化开展乡村普法宣讲、免费法律咨询。2026年3月，我和区司法局前川司法所一起走进双凤中学，给全校学生做了一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讲座。当时我结合河北邯郸少年杀人案等真实案例，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话讲解刑事责任年龄、盗窃罪构成这些法律知识，也告诉他们遇到侵害怎么保护自己。看到台下几百双眼睛认真地看着我、听我讲解，我觉得这种普法比办多少案子都更值。我还受聘担任武汉市医保基金监管社会监督员，参与民生基金监督，守护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

在基层跑得多了，看到的问题也就更具体了。有些事光靠服务解决不了，得从政策层面推动，这让我对政协委员这个身份有了更深的理解。

一份建议，一份担当

我是黄陂区第五届、第六届连续两届的政协委员，同时也是一名民盟盟员。我特别珍惜这个平台，也一直跟自己说：不写空泛文章，不提脱离实际的建议。每一份提案和建议，都必须来自我在办案和服务中发现的真问题。

有一件事对我触动特别大。在代理一起案件时，我遇到了吴某锋，这是一位村党支部委员，在根据村委会安排执行防火除草公务时，不幸被割草机碎片击中眼部，造成八级伤残，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47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定，村干部与村委会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没法走工伤保险，只能依据民法典公平原则，判决由作为受益方的村委会和进行工作指导的街道办事处共同补偿25万元。

这个案子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位干部是因公受伤，是为集体的事受的伤，结果既没有工伤保险兜底，现有保险赔付也远远不够。我深入了解后发现，黄陂区委组织部虽然给村干部买了责任保险，但人身伤亡责任限额只有10万元，医疗费用限额只有1万元。吴某锋伤残八级，10万元能顶什么用？这还不算，我又查了重庆的一个类似案例——村委会委员王某才受指派递送危房改造资料途中遇车祸身亡，法院同样判了镇政府、村委会补偿其近亲属25万元。这说明在司法实践中，村干部因公受伤或身亡，补偿二三十万元是常态，但我们的保险额度还停留在十万元级别，中间的缺口谁来补？

保险的核心功能是分散风险、补偿损失，可当保额显著低于司法实践中普遍的补偿标准时，保险就失去了“安全网”的作

用。村干部流血流汗，不能让他们再流泪。针对这个问题，我深入调研，撰写了《关于统一提高村（社区）干部履职意外伤害责任保险限额 筑牢乡村振兴人才保障根基的建议》，提出大幅提高保险责任限额到100万元至200万元区间、优化保险责任范围、建立区级统保模式、明确理赔衔接机制等具体建议。

让我特别欣慰的是，这条社情民意信息被湖北省政协采纳，后来还被全国政协采用了。

收到通报那天，我既高兴又感慨，高兴的是建议有了回响；感慨的是，如果没有代理吴某锋案的一线经历，没有在基层跟村干部打成一片的日常，我写不出这样的建议。

履职这些年，我先后提交了十几件政协提案。针对法院“胜诉退费”落实不到位的问题，我提出落实胜诉方诉讼费主动退还的建议；针对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后人少事多、能力不足的问题，我提出深化执法改革的建议；针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深入的问题，我提出规范股权管理的建议；针对看守所律师会见预约难的问题，我提出优化预约系统、增加会见室的建议；针对农村“三资”合同风险突出的问题，我提出开展专项普法的建议。上述每一条都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在办案中、在服务中、在跟群众聊天中发现的真问题。

十多年的法治工作，两届政协履职，我一直在黄陂。从一个普通执业律师到律所带头人，再到政协委员、市律协乡村振兴法律专委会主任，身份变了好几次，担子也越来越重。但我心里清楚，我还是那个黄陂本土



主持王家河街赋权综合行政执法培训会

的法律人，还是那个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基层的普通律师。

基层一线的摸爬滚打，让我深知治理的难点在哪里、群众的痛点在哪里，也更明白一名民盟盟员、政协委员肩上的重量。每一本案卷背后都是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每一份建议背后都是一群人的期盼。我不敢马虎，也不能马虎。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民盟初心、践行委员使命，立足法律专业，持续深耕基层法治建设、乡村振兴服务和参政议政工作。努力当好基层法治的守护者、群众利益的维护者、区域发展的建言者。

做好玩的中国游戏，讲动听的世界故事

◇ 曾 彬

人物名片：曾彬，湖北省江西商会常务副会长，武汉掌中互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EO。

玩儿，是自然需求；玩儿，是本能冲动。玩儿之前，不需要有什么“意义”——玩儿，本身就是意义。如果能在过程中学到一些知识，那便是“加倍有意义”。

我从小学开始玩游戏，大学毕业论文也是游戏研发相关，2007 年从一个研究所辞职一头扎进游戏行业创业，一路走到今天，算是把少年爱好干成了一辈子事业。亲闻亲历了行业起起伏伏，早年中国大陆 14 亿人的手机游戏市场不如中国台湾地区 2300 万人，大陆很多研发商只能给海外发行代工；后来武侠端游冲进东南亚打开销路，手游时

代咱们靠 MMO、策略游戏横扫全球，再到现在《原神》《黑神话：悟空》这样的 3A 大作站上国际舞台。当海外玩家为璃月的山水驻足、为悟空的神话震撼时，游戏早已超越娱乐产品，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崭新名片。

读懂游戏，更要读懂自控

1985 年，我出生在江西吉安峡江县，一座风景秀丽的赣江边小城。我和两个弟弟偶尔会一起去隔壁电子游戏厅打打游戏，但互相监督、比较克制，父母对我们兄弟三人也没有管束太多，大部分时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初一到高一，我的成绩也一直在全校名列前茅。



嫦娥、后羿、姜子牙、地藏菩萨的游戏形象

随着高考临近，学习压力增加，高三开始沉迷游戏。我把零花钱攒下来，晚上去网吧打游戏，每天只睡2—4个小时。睡眠不足必定影响学业，成绩明显下滑引起母亲的注意，温柔的母亲给我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她掉泪的那个瞬间我一下醒悟过来，签下保证书，承诺高考前不会再打游戏。

那时我就意识到打游戏虽然能启发大脑，但不能沉迷。凡是能让人上瘾的东西，很容易让人沉迷以至于失去控制，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心性。很多让人沉迷的事情都是如此，不单单是“游戏”的“原罪”。

千百年来，琴棋书画乃华夏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技艺、文化素养的表象；善棋者谋略过人，处事明智。但在现代的中国，游戏被误会久矣。

中国成语中有“玩物丧志”一词，常被惯性思维者用来指责沉溺于非正常工作

之外的爱好，其中电子游戏也是一种。多年以来的主流观点习惯将游戏产业列入副册；甚至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电子游戏就是会腐蚀灵魂的“电子海洛因”、“精神鸦片”。

这是对游戏片面的认知和深深的误解。电子游戏也被称为第九艺术，不仅有娱乐属性，也有科技属性、文化属性、艺术属性。现在我自己也当了父亲，对待孩子玩游戏我一直是以疏导为主，不会一刀切禁止。周一到周四不让玩，每周根据学习、做家务的表现打分评级，分数高低直接决定周五到周日能玩多久。

益智类游戏能提高小孩的阅读理解能力、动手能力、逻辑能力、目标感……黑悟空这种大型ARPG

游戏也能普及中国传统神话和文化知识、审美等；中小学生用scratch、VB等编程语言来编写游戏，能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寓教于乐；北京部分中学，以及武汉的部分大学开始摸索游戏化教学方式，通过参考游戏的元素例如目标、任务、奖励、排行、竞争、协作、道具、关卡等概念，让教学更有亲和力、接受度更高。只要把控好时长，游戏完全能成为孩子成长的辅助，根本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树立目标，更要尊重热爱

2002年，我考上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辅修工商管理双学位。在校期间，一位室友让我大受震撼。他是隔壁班的第一名，闲暇时他也玩电脑游戏，担心沉迷，但每次下线关机后，会将电脑拆分成零部件，下次玩时

再不厌其烦地重新组装。他是个目标感很强的人，入校就计划大四去美国留学，自律加上强目标感让他最终如愿，如今在职场上大放光彩。反观很多人在校时浑浑噩噩，毕业多年都不知道该从事什么。

人生若无目标，行动便无归宿，目标感是驱散迷茫的光，是支撑我们跨越困境的力量，而热爱是孕育目标感的源头。读书时我就痴迷写玄幻、奇幻游戏剧情小说，还作为武大的校园代表参加《今古传奇》杂志社举办的中国第一届奇幻峰会，有幸与树下野狐、说不得大师等大咖同台。

说不得大师真名邢山虎，2003年他创办公司做出《天骄 Online》，算是那时候国产网游的标杆，巅峰时期在线十万多人，在国外游戏垄断市场的环境里硬生生闯出一条国产原创的路。他的经历给了我很大鼓舞，写小说的同时，我也没有放弃对游戏的热爱，编了一些简单的小游戏，毕业论文也是与游戏相关，还获得湖北省优秀论文奖。

2006年毕业，我通过校招来到广州，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CETC）第七研究所做无线电产品的开发。彼时小蛮腰还未建，单位对面就是珠江电影制片厂，环境很好，同事们也很好。但我本身偏爱软件、热爱游戏，这份工作始终找不到归属感。

2007年下半年，两个伙伴拉我回武汉创业，一人负责技术搭建，一人把控游戏策划，一人负责美术视觉包装，策划定玩法、技术做骨架、美术做皮囊。三人一拍即合，正式踏上游戏创业路。选择扎根武汉光谷，最实在的优势就是高校扎堆，人才源源不断，能给游戏公司持续输送人力，为我们后来的团队打下扎实基础。

刚起步那会儿我们一腔热血，可三个人都没大厂从业经历，完全不懂商业化怎么



获评 2025—2026 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做，踩了数不清的坑。最开始不知道什么叫付费率、LTV、ARPU、ARPPU，做研发没有商业化的意识，导致产品的数据模型不够健壮，产品能做出来或者赚点小钱但无法规模化推广。一腔热血做研发，但没有足够多的发行关系和渠道资源，只能以最基础的方式给海外的发行公司代工，利润跟我们无关，仅仅是团队生存的口粮。

外人只看得见《黑神话》这种爆款风光无限，却不知道游戏行业九成以上中小团队最后都是炮灰。身边朋友一波波起起落落，同时自己也走过无数弯路，最终使我彻底认清一个道理：别人再赚钱，跟风也没用，踏踏实实深耕自己擅长的领域才长久。

勇于创新，更要顺势而行

游戏产业主要分为手游、端游（PC 客户端游戏）、页游（网页游戏）、主机游戏四个领域。

创业初期手里预算紧巴巴，只能做低成本手机单机轻度游戏，开始的六七年公司不上不下，日子过得格外煎熬。那时候大陆手游技术、市场成熟度远不如台湾地区，但移动市场的增长潜力肉眼可见。我们反复沟

通，说服一位中国台湾地区的投资人入局，靠着这笔资金硬扛着往前走。

2013 年智能终端兴起，移动支付、游戏付费通道全都打通，手游市场迎来爆发期，我们早年打磨的单机产品慢慢有了流水，可也仅能维持收支平衡。后来拿到深圳一位大佬的融资，在投资人指点下，我们才真正建立起商业化思维，不再只埋头做内容，开始盯着付费率、用户生命周期价值、单用户付费额这些核心数据。

2014 年是我们团队的关键转折点，也是公司正式实现盈利的一年。这年我们下定决心全力出海，同步开发中文简繁体、英语、泰语、韩语、越南语等多语言版本，深耕港澳台、欧美、东南亚市场，近几年也陆续拓展了俄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语种。2014 至 2016 那几年，公司核心团队几乎没有凌晨两点前下过班，研发、多语言本地化、海外运营连轴转，一刻不敢松懈。

做游戏这么多年我也摸索出一套产品立项和商业化逻辑，光靠感性凭空创作，剧情画面再好也脱离市场，很难活下去；只盯着冰冷数据做产品，又会丢掉游戏该有的美感和故事温度。最合适的就是把美术审美、文化叙事和商业化数据模型绑在一起，平衡好艺术和赚钱，才能做出长线受欢迎的产品。

之后我们团队规模慢慢扩张，巅峰时期四条产品线同步推进。可没过多久，国内手游赛道彻底卷成红海，流量成本一年比一年高，行业内卷严重。我们果断砍掉所有不赚钱、没有长线潜力的项目，收缩团队规模，把重心全部转到 Unity 3D

（游戏引擎）的放置卡牌游戏研发上，只保留一条相对擅长的产品线。

管理上不断完善。公司秉承利益共享的原则，每个季度拿出固定的利润比例分红给大家，提高员工积极性。实行矩阵式管理，即部门制为主，项目制为辅，任何产品赚了钱，公司总监级别的和核心人员都能拿奖金。因为一个产品能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产品失败，也不代表整个团队的人都不合格。不过多强调治人管人，更多地强调产品目标、任务拆分、层层落地的干实事逻辑，营造出轻松、灵活、务实的文化氛围。

公司也一步步获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瞪羚企业，前两年还拿到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的荣誉。核心团队大多来自武大、腾讯、畅游，拥有丰富的出海项目经验，产品覆盖中国港澳台地区，东亚、东南亚、欧洲、拉美等几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不止是生意，更是东方文化的全球对话

如今公司海外营收占比稳定在七成以上，国内市场竞争白热化的时候，海外就是



公司荣誉墙

我们稳定增长的第二条出路。一套成熟的核心玩法，只要针对不同地区做好本地化翻译、美术调整、习俗适配，就能推向全球不同玩家。

回头看国产游戏出海这么多年，变化翻天覆地。早年只是单纯给海外厂商做代工，没有任何自主话语权；后来靠端游、手游输出产品，主打盈利创收；到现在我们这批厂商主打文化出海，在外汇创收的同时，也通过游戏这种有粘滞度、有亲和力、有商业化价值的形式将中国的游戏推向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中国游戏出口，不只是数字产业从底层逆袭的奋斗史，更是东方文化跨过语言和国界，和全世界年轻人对话的全新方式。

很多海外玩家看着游戏里的中式山水、传统神话感到震撼，这种沉浸式交互带来的文化共鸣，是书籍、影视很难做到的。游戏作为第九艺术，想要做出能打动全世界的好作品，没有什么投机捷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把游戏当成游戏来做，不盲目追逐流量流水，不丢掉文化内核与艺术初心，平衡好生存和内容，才能长久立足全球市场。

未来 AI 工业化会全面铺开，从美术到运营全流程降本增效，但有独特文化创意、完整叙事的团队才能站稳脚跟，流水线换皮产品会慢慢被市场淘汰；单一产品通吃全球的时代彻底结束，出海拼的是精细化本地化运营，每个地区的审美、宗教、付费习惯都要单独适配；粗制滥造的换皮小游戏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精品 3D 游戏、有本土文化特色的长线游戏会成为市场主流；中华五千年神话、武侠、非遗、历史，是咱们国产游戏



公司赴荆州方特团建

独一份的竞争优势，把传统文化融入游戏，既能抓住国内玩家，也能打造区别于欧美、日韩游戏的独特标签，游戏也会长期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

“务实，拥抱变化”是掌中互娱秉持的发展原则，研发公司需要务实，决策务实、制度务实、管理务实……手游公司需要拥抱变化，行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玩家的属性、市场的窗口一直在变化，公司不随之改变进化很快会被淘汰。

踏踏实实做好玩的中国游戏，认认真真向全世界讲动听的东方故事，这是我和团队会坚守的初心。以游戏为桥梁，让更多人透过屏幕看见鲜活、厚重、独具魅力的中华文明。

周恩来在武汉的抗战足迹

◇ 梅兴无

1937年12月，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托来到武汉，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推动国共合作，扩大中共的影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抗战。在武汉，周恩来度过了一段不平凡经历，留下了光辉的抗战足迹。

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促进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一些重要的党政军机关则驻足武汉办公，武汉一度成为事实上的抗战首都。八路军南京办事处随之迁至武汉，改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武汉成为中共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阵地。

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由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叶剑英、

董必武等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组建新四军。

12月18日，周恩来一行来到武汉，八办成为中共代表团、长江局的驻地。21日晚，王明、周恩来、博古会见蒋介石。周恩来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共同纲领、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和出版《新华日报》等一系列问题提出建议。王明谈了国共两党关系、陕甘宁边区等问题。蒋介石认为“外敌不足虑”，军事失利“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他寄希望于中共劝说苏联出兵帮助中国，而王明和共产国际关系密切，便提出王明“在汉相助”。双方还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达成协议，中共方面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参加，国民党方面由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参加。

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将两个机构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为长江局。长江局



长江局主要成员（右起）王明、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在武汉合影

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由于王明是个空头理论家，刚从苏联回国不久，对国内情况不熟悉；而周恩来一直是中共重要领导人，又曾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蒋有过合作，所以事关全局性的具体工作，基本落在周恩来肩上。

12月26日，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定周恩来、刘健群起草抗日救国共同纲领。30日，长江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周恩来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中共中央对共同纲领非常重视，毛泽东表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是新三民主义，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应有一个共同纲领。但国民党却对共同纲领不感兴趣，因它不想有一条“绳索”绑住自己。所以，在两党关系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他们将会谈重点转移到请中共帮助促使苏联出兵的问题上。

尽管共同纲领没有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回应，但周恩来仍不遗余力地推动国共合作。根据中央精神，他向蒋介石提出了国共合作的三种方式：一是国民党改造为民族革命联盟，其他党也加入；二是建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和各级共同讨论；三是现在这种形式，遇事协商。蒋介石最终拒绝了前两种，

采纳了“遇事协商”的方式，而“协商”基本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进行。周恩来在回忆这段谈判历史时说：“他们那时叫‘溶共’政策，好像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们没有做贾宝玉，化不了。”

经过谈判，周恩来提出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的建议为蒋介石所接受。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

“在非常时期应设立国民参政会”。中共最后确定毛泽东、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7人为参政员。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汉召开，舆论认为“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国共合作也得到巩固和发展。

然而，在国共合作过程中的杂音仍不少。1938年初，武汉《扫荡报》等报刊发起“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宣传运动。2月10日，周恩来就此约见蒋介石、陈立夫。蒋介石表示，并不限制各方对主义的信仰，唯愿溶成一体。周恩来明确回答，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认为可以研究，并说《扫荡报》的言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他本人的意见。陈立夫补充说，蒋已经批评了《扫荡报》，要求各报以后不得再刊登这类文章。

蒋介石既以周恩来为谈判对手，又想通过接纳周恩来表明对国共合作的“诚意”。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个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邀周恩来担任副部长。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副部长一



1938年，周恩来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职。这个职务是抗战时期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唯一要职。3月下旬以后，周恩来在武汉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是用来做政治部的工作，白天在政治部上班；晚上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日夜操劳，十分繁忙，常常通宵达旦。

周恩来充分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与国民党军政要员频繁交往。冯玉祥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周恩来亲到冯玉祥寓所与之促膝长谈，向冯介绍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深得赞许。此后两人建立起亲密关系，冯玉祥对周恩来的工作给予多方面的支持。

白崇禧时任军委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1938年3月前往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前，到周恩来处请教对敌作战方略。周恩来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提出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方针，并表示将在军

事上配合。周恩来向中央建议，派八路军、新四军有关部队牵制日军，策应李宗仁部作战，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周恩来及时把它介绍给白崇禧。白崇禧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将其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向蒋介石极力推荐，蒋把这两句话作为全军的抗日最高战略方针。

指导开展独立的游击战争投入抗战

在长江局的诸多工作中，不论是恢复南方各省共产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还是组建新四军并东进抗日，部署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周恩来都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十年内战期间，南方各省的共产党组织基本上被破坏殆尽。在周恩来等的领导下，重建了南方各省的党组织，使国统区中共党的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38年9月，在15个地区重建了省委、省工委、地区党委、特别区（市）党委，党员发展到67780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27%，为抗战和后来的革命斗争积蓄了力量，培养了骨干。

上海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周恩来非常重视上海党组织的重建，他同负责重建工作的刘晓谈话，强调上海应建立一个巩固的党组织，对保存下来的组织不能按原班人马接过来，而要个别审查清楚后，再确认其关系；重建后的上海地下党党员，政治上必须可靠，又有荫蔽条件。刘晓根据这个指示，恢复党的各级组织，然后成立了江苏省委。1938年6月，周恩来、董必武等指导中共湖北省委成立鄂东、鄂南、鄂中特委和鄂西、鄂北中心县委。每一区域派得力干部去发动群众，筹备建立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组建新四军是长江局的重中之重。周恩来一到武汉，就同项英与先期到汉的叶挺一起研究新四军的组建问题，决定马上筹建新四军军部。在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第一次联席会议上，重点讨论了新四军组建问题，决定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迅速集中，组建新四军，全部开往抗日前线；项英的主要工作应在新四军方面，周恩来领导的长江局参谋处研究作战方案供新四军参考。会后，周恩来、项英等联名致电中央书记处，请求派往新四军的干部迅速到汉，同时与叶挺等研究成立新四军军部问题。



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大和街26号正式成立，经中共中央批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兼政委、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在新四军干部大会上，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关于独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力量的指示，部署新四军集结东进行动。在以后的短

短两个月时间里，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胜利完成了下山、整编为新四军的任务，开赴敌后抗日战场。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对鄂豫边的新四军四支队的工作予以具体指导。1938年初，周恩来在武汉向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传达中央指示，要求他们迅速从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向东挺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独立的游击战争。四支队东进后，由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改编的新四军四支队八团，进入竹沟休整。周恩来指示，其行动由长江局参谋处指挥，并向中央建议调八路军参谋处处长彭雪枫来豫，担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到竹沟主持军事工作。彭雪枫对八团进行整编，壮大了队伍，3月开赴敌后抗日战场，其家属、伤病员还有部分武装留在竹沟，成立八团留守处，由王国华负责。

9月，周恩来指示河南省委将领导中心向豫南转移，与八路军冀鲁豫部队沟通联系。竹沟成了中原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有“小延安”之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彭雪枫在竹沟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10月1日奉命从竹沟出发，向豫东挺进，周恩来特地安排武汉八办拨6挺苏式转盘轻机枪送往该部。

新四军创建伊始，薪饷和军需都十分困难。预算每月为16.6万元，但何应钦只批6.5万元。请发1万套棉军衣，何应钦竟批：新四军打游击，不需要军衣。周恩来三番五次找何应钦、陈诚、顾祝同等要员据理力争，终于将预算增至每月9万元。周恩来还同路过武汉的安徽财政厅长章乃器交涉，希望他能够对驻安徽境内的新四军予以财政支持。章乃器返皖后，每月给新四军补助3万元。

根据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需要，周恩来指示八办为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筹集了大批武器弹药、医药用品、军需装备和几十万斤大米、面粉，以及皮革、毛纺、造纸等制造设备。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成立后，周恩来设法给炮团购置一架炮队镜和一部测定机。从香港购得一批驳壳枪，支援鄂中敌后游击战争。

在周恩来等的领导下，1937年冬，中共湖北省委委托方毅主持，在七里坪秘密举办训练班；1937年冬至1938年夏，中共湖北省委通过统战关系，由陶铸主持在应城汤池举办了三期训练班；1938年春，八办在武汉大学举办游击训练班；1938年3月，彭雪枫在竹沟成立军政干部教导队。各类培训班的学员结业后，分赴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游击区，许多学员成了新四军的骨干。

宣传动员社会各界团结抗战

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后，分管的三厅是负责宣传工作的，他力荐郭沫若担任三厅厅长。1938年2月，周恩来拜访著名作家老舍，希望他出面将流亡到武汉的文化界人士联合起来，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运动。3月27日，在周恩来的推动下，经过老舍和阳翰笙等人的筹备，文协成立大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举行，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邵力子为文协成立大会总主席，周恩来等被推举为名



1938年，周恩来（前排左三）、郭沫若（左四）和部分三厅工作人员合影

誉主席团成员。随后，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各协会相继成立，拉开了抗日救亡宣传运动的序幕。

4月7日，以三厅名义发起武汉各界抗战宣传周活动，周恩来对宣传周做了周密部署。宣传周首日夜晚，举行庆祝台儿庄大捷的火炬游行，参加的人数达四五十万，汉口一片沸腾。数百个宣传队运用歌咏、戏剧、电影、美术等形式，在武汉三镇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宣传活动，艺术家们演出街头短剧，学生们发表演说，画家们的漫画贴满街头。入夜举行火炬游行，在长江之上，武汉三镇之间，抗日花灯火炬和几百条船组成的歌咏队，绵延数里，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武汉三镇，整个武汉的民众都动员起来了。沉寂的江城“的确是复活了”（郭沫若语）。

文协成立了10个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周恩来要求他们深入前线部队和农村、工厂中演出，发挥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作用。冼星海和音乐工作者在中山公园体育场，组织了一次轰动整个武汉的万人大合唱，激励了人们的抗日救亡斗志。

周恩来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到电影拍摄现场，勉励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拍出好的片子。袁牧之、陈波儿等拍摄的电影《八百壮士》，名演员金山、王莹演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轰动一时。抗日救亡宣传运动把不同政见、不同爱好的各界人士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基础，有力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由此催生了抗日救亡团体的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武汉青年救国团等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在江城大地不断涌现。

8月，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被国民党无理解散。周恩来当即给武汉卫戍司令部打电话，义正词严地斥责其非法行径，并以政治部副部长的名义命令宪兵马上撤走。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抗日救亡团体发挥联系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爱国热情，以不同方式为反抗侵略、挽救民族危亡贡献自己的力量。周恩来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说，号召青年学生到军队里去，到乡村去，到敌后去。许多热血青年纷纷来到武汉八办，报名去延安和解放区。周恩来要求“八办”对他们要热情接待，妥善安排。不到一年的时间，“八办”就输送成百上千有志青年去延安和解放区。

在“七七事变”周年之际，三厅组织发起了献金救国运动。周恩来带头捐出一个月薪金240元。武汉各界群众积极响应，短短5天里就获得捐赠100万元，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工商业者以至擦皮鞋的小孩子。有一位人力车夫，每拉一次客人就献金一次，把那几天他所有的收入，全部捐献出来。周恩来、郭沫若等组成慰劳总会，将这笔巨额献金全部用于慰劳前方将士。阳翰笙

携30万元亲自到香港购买药品、医疗器材和10部卡车，运回后分送至10个战区。那时前方将士患疟疾的很多，购回的奎宁及时送至前线，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周恩来代表中共同国民党反复交涉，争取到在国统区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合法权利。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出版。1月17日，一伙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和印刷厂。周恩来立即同武汉有关当局交涉，要求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保证了《新华日报》的正常出版发行。周恩来经常审阅报纸的社论和重要专论，还亲自为报纸撰写社论、专论。在武汉外围战事日趋紧张时，《新华日报》派出战地记者上前线采访，多次报道国民党军队的抗战事迹，登载了国民党一些领导人的抗战言论，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华日报》宣传中共抗日路线和方针，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称赞“《新华日报》起到了一个方面军的作用”。

1938年10月20日，武汉形势急转直下，报刊大多停刊，《新华日报》成了武汉市民唯一能看到的报纸。为了使报纸不致中断，周恩来决定分两批疏散人员和运送物资前往重庆，《新华日报》必须出版到10月25日。武汉一停刊，重庆接着出版。10月24日晚，周恩来来到报社，为在武汉出版的最后一期《新华日报》口授社论《告别武汉父老》。此时，隆隆炮声已从城东北角传来，周恩来泰然自若，召集报社留守的编辑、排版、印刷三人说：“国民党已经撤离武汉，蒋介石也走了，但我们共产党人要坚持到最后的时刻才能撤退。”周恩来走出报馆时，已是25日凌晨。

当天下午，武汉沦陷。在汉的国民党

党政军要人，早几天甚至一个月之前就已撤走，而周恩来一直坚持到最后才离开武汉。

争取国际友人支援抗战

中共代表团到武汉之后，改变了中共过去除苏联以外，与国际社会基本隔绝的状态。周恩来等主动与国际友人交往，为中共外事工作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为扩大国际影响，长江局设立国际宣传组，这是中共的第一个外事工作部门，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王炳南具体负责，成员有章汉夫、陈家康、王安娜等。国际宣传组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翻译毛泽东《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两篇著作就翻译完成出版，这是毛泽东著作的最早英文译本，扩大了中共及其领袖的国际影响力。而大量的工作则是对外交往，周恩来身体力行，广结国际友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

1938年春，周恩来以中共代表身份，会见了英、美两国驻华使节。全面抗战爆发后，英、美等国的外交政策对中国是不利的。日军占领上海、南京，侵入中国腹地后，英、美在华利益直接受到威胁，于是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周恩来肯定了英、美转向援华的姿态，同时指出有的国家仍采取“不干涉”的“绥靖”政策，搞“东方慕尼黑”，有诱使国民党当局向日本妥协投降的危险性。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应周恩来的要求，协调英国香港总督准许设立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帮助中共拓展了国际空间。在美国总统罗斯福倡导下，美国民众募捐100万美元援助中国。周恩来在会见卡尔和美国总领事戴维斯时，表示了赞赏和感谢，希望进一步加强中英、中美关系。同年3月、8月，周



1938年，周恩来、邓颖超在武汉会见斯诺

恩来两次会见美国海军情报官卡尔逊上尉，卡尔逊在1940年出版《中国的双星》，记述了这两次会见，盛赞“周的才智在中国是出类拔萃的”。

1938年2月，周恩来会见新西兰籍英国记者贝特兰。1937年10月，周恩来在山西曾两次会见过他。这次周恩来向他分析了抗战形势，表示在抗战胜利后，我们将需要发达国家更多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以重建中国。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到那时都可以由和平协议来解决，我们将欢迎外国资本来中国投资，在中国开办企业。会见结束时，周恩来还让贝特兰带信给正在香港筹建保卫中国同盟的宋庆龄，请她为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医药援助。1938年3月，贝特兰与宋庆龄见面，他们共同筹划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医疗援助的办法。1939年夏，贝特兰不畏艰险，护送12辆卡车和600箱医药用品到解放区，支援中国抗战。

1938年6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来到武汉，周恩来、邓颖超专门约斯诺到珞珈山寓所畅谈。周恩来一再感谢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中外的影响，希望他再次到延安和敌后采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情况。临别时，周恩来相赠刚出版的毛泽东《论持久战》。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斯特朗等都是周恩来最早与他们结识，并亲自安排他们到延安和解放区去采访的。他们写下不少客观反映中共和八路军的文章，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争取到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在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斯特朗《人类的五分之一》、贝特兰《华北前线》等书中，都有在武汉同周恩来交往的记述和评论。

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斯来到武汉，周恩来与他长谈，希望他多拍摄中国人民抗战的片子。伊文斯在汉口一所教会学校，秘密拍摄了一组当时在汉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活动的影片，还赠给八路军一部电影摄影机和三盒电影胶片。后来，延安电影工作团用这部摄影机，拍摄了毛泽东在陕北和八路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珍贵影片。

新西兰友好人士艾黎等筹集资金，把中国难民组织起来，开展“工业合作运动”，支援抗日战争。每当艾黎遇到困难时便来武汉，周恩来帮助他排忧解难，勉励他坚持下去。艾黎后来感慨：“工合”运动之所以能在抗战中发挥作用，是与周恩来的支持分不开的。

周恩来在武汉接待了前来援助的外国医疗队。1938年1月20日，以白求恩为首的美加援华医疗队抵达武汉，周恩来立即会见白求恩，并亲自安排白求恩很快离开汉口，3月下旬到达延安，随后到抗日前线参

与救护。柯棣华带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在武汉期间，周恩来热情接待了他们，这支医疗队到延安后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对海外广大爱国侨胞捐金献物和回国参军参战的爱国行动，周恩来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著名侨领陈嘉庚在马来亚新加坡发起成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司徒美堂在美国纽约组建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进行持久而大量的筹款活动支援抗战。周恩来在武汉多次会见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人，热情赞扬他们的爱国之举。周恩来明确指示在香港八办的廖承志，要他大张旗鼓地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捐赠的救护车运到武汉以后，叶剑英、李克农等代表八路军向他们表示感谢。

美国学者休梅克在《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评价，抗日战争前期中共对外联系达到“高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国人“可以同汉口的共产党代表自由接触”。不少人从认识周恩来到认识共产党，从相信周恩来到相信共产党，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

主要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
- [2] 童小鹏：《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华文出版社，2006年。
- [3] 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 [4] 王涛：《抗战初期周恩来在国共军事合作中的独特贡献》，《党的文献》2014年第6期。

梅兴无，湖北省鄂州市委原副秘书长

吴石将军在武汉抗战中的著述（下）

◇ 邓正兵 任泰宇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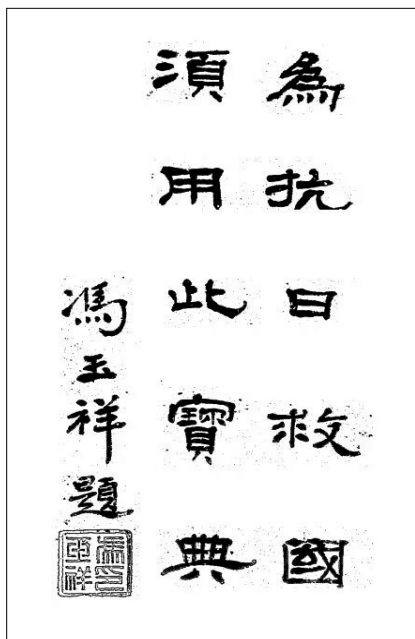
吴石阅历丰富，好学善思，著述不断。从武昌毕业后，吴石先后就读于保定军校、日本东京炮兵专科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并在粤军、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福建省军事厅参谋处、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等处任职。

1934年从日本回国后，吴石担任陆军大学教务处兵学教官。教学之余，吴石积极进行军事理论的研究和普及，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先后出版了《近代战争与国防之本质》《警察学纲要》《兵学辞典粹编》《参二室蓝皮本》《〈战争论〉之研究》等多部著作。其中，《兵学辞典粹编》是民国首部体系完备的综合军事术语辞典，该书于1936年12月出版后，广受好评，被军界誉为“最优良之军学参考”，半年中连出五版。1938年6月，《兵学辞典粹编》在汉口又出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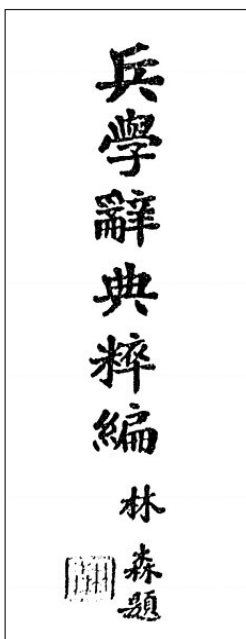
第六版，成为武汉抗战时期军事教学培训和作战指挥的重要参考著作。

《兵学辞典粹编》是吴石以陆军大学讲授的战术、战史教材为基础，增加自己军事研究成果编纂而成。吴石在陆军大学任教之前，其战术课程多由德籍顾问担任，他们自恃甚高，态度傲慢，目中无人，导致学生不满教官引发风潮。吴石主讲战术课程以后，得到全校师生一致好评，德籍教师也有所收敛。

吴石《兵学辞典粹编》的出版，得到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大力支持和较高评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该书题写书名，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副委员长冯玉祥、参谋总长何应钦、办公厅主任朱培德、执行部主任唐生智等人都为该书题词，分别为：“研究兵学之良导”“为抗日救国须用此宝典”“程才效技精研博识，简当不啻群资准则”“军学津梁”“博大精深”。国民政府训练总监



冯玉祥题词



林森题写书名

部副监周亚卫、张华辅，军政部常务次长曹浩森，陆军大学教育长张治中，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杨杰、熊斌，宪兵司令谷正伦，军事委员会第一厅厅长龚浩，南京市警察厅厅长陈焯等9人为该书作序。1938年汉口版仅保留林森题写的书名和蒋介石的题词，其他题词和序言一并删除，正文则未作改动。

《兵学辞典粹编》全书共10万余字，分为战争通说、军制、战略及战术、各兵种战术、后方勤务、上陆作战、要塞之攻防、兵器、筑城、地形及测图、交通及运输、情报宣传及谋略十二章。

吴石依照战争逻辑分门别类收录军事术语，全书词条分为六大门类：战争与军制类（战争定义、国防体制、军队编制、兵役、军衔、后勤、军事行政等基础制度术语）、作战战术类（古今战法、阵形、攻防、行军、宿营、侦察、会战、游击、各种兵种运用等战术核心词汇）、兵器筑城类（冷兵器、近代枪炮、弹药、要塞、堡垒、野战工事、障碍设施等）、地形交通类（战场地形分类、

河川、山地、隘路、铁路、公路、运输补给相关术语）、谍报宣传类（情报侦察、反间、军事宣传、心战、舆论作战等早期军事心理战概念）、新兴空军与国防类（航空战、防空、近代总体战、国防本质等当时新兴军事领域词条），条目层次清晰。

在释义写作体例方面，吴石确立一套规范释义范式，所有辞条统一遵循定义阐释、源流考证、运用原则、战史例证、对照辨析、分类编排的标准结构进行编纂，即每条术语均追溯词源、辅以战例佐证，摒弃单纯名词罗列，将术语释义与战术运用、历史实战结合，确立“术语—理论—战史”

三位一体的军事研究方法。如书中第三章《战略及战术》第一节《战略及战术通说》中释义“战略预备”等辞条如下：

战略预备 作战预备 会战预备 总预备队 战术预备（预备队）。

战略预备者，因作战或会战指导，以战略的运用之目的所控之兵团之谓也。通常分为作战预备，及会战预备。

作战预备者，最高统帅应于作战之推移变化，于所要方面，备资企图新作战，或于所要方面，增大作战军兵力等之目的，所控置之预备也。

（例）日俄战争初期之第七师。普奥战争初期普之近卫军团。普法战争初期，普之第一、第二、第六等军。欧洲战争法军巴黎附近控置预备师集团。奥匈国内所控置之兵团，以及俄第六军等是也。

会战预备者，因指导会战而期胜利之确得所控置之部队之谓也。

（例）日俄战争奉天会战时之第三师，及其他数个后备旅是也。

会战预备，及作战预备，理论上固如上述之解析，实际上其区分未必分明。

（例）如一九一四年夏，俄之第六军，德之北方军等为作战预备，而一时有守备监视一定地方之任务。又德之补充六师，半似为作战预备，嗣成会战预备而使用之。通常会战预备必须控置，作战预备则非绝对必要。

总预备队者，防御时指挥官所控置之预备队也。

战术预备者，通常师以下控置之预备队，俾遂行战术的术策之用。军司令官（军长）所控之预备队，亦有属于此种者，又通称为预备队。

《兵学辞典粹编》这样的辞条释义，条分缕析，逻辑清晰，既有理论性，又富实操性。民国前期军学著作多照搬德、日军术语，同一概念名称各异、释义冲突，极易造成指挥与教学偏差。《兵学辞典粹编》兼采中西兵学、兼顾国内军队使用习惯，对 1000 多条军事术语做界定、溯源、释义，完整覆盖战争、军制、战术、兵器、筑城、情报、航空等全领域术语，形成一套标准化军语体系，填补军事辞书门类空白，成为民国军语学科萌芽的标志性文献。书名“粹编”即萃取核心术语，舍弃细碎冷门专业词条，兼顾初学军官与资深研究者，这种分层取舍、实用优先的编纂思路，至今仍是军事科普、基础军事教育工具书的编写准则。1941 年，吴石又编纂出版了《兵学辞典粹编续编》，《兵学辞典粹编》也同时出版了第七版。

四

武汉抗战时期，吴石担任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副厅长，主持实际工作。第二厅下设四

处，第一处处长吴石兼任，主要职责就是对日作战情报搜集；二处处长郝恩绥，负责国外情报的搜集、研制和武官人事派遣工作指导；三处处长郑介民，负责友军（八路军和新四军）情报和边疆情报的收集；四处处长魏大铭，负责谍报电信、侦查电信、集训译电人员和专业谍报电信人员。

吴石带领第二厅搜集了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大量情报，供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决策参考。吴石后来回忆道：“忆在汉口时，今主席（指蒋介石）每周必召见咨询一次，深为嘉许。”武汉沦陷时，吴石随军事委员会撤离，不久担任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参谋处处长。

吴石根据自己在武汉抗战时期收集的资料，加上之后的总结分析，撰写了《敌军死亡统计》一文，统计了日军在 1937 年 10 月到 1938 年 10 月（主要是武汉抗战时期）一年间的伤亡损失数字。1939 年 1 月 21 日，《扫荡报》全文刊发文章内容，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当时，日军占领中国临时首都武汉，气焰嚣张，汪精卫刚刚叛国投敌，“亡国论”甚嚣尘上。《日军死亡统计》一文开宗明义，就是要通过统计日军死亡数字，说明日军必然失败：

兹特根据确实之材料，仅就日军在一个年以内之消耗实数，精密统计。如依此项统计而观，除经济之崩溃、财政之竭蹶外，外交之孤立等等，足制日军之死命者，姑不具论，即专就兵力之补充一端言之，日军覆灭之期必不在远。

为此，吴石选取三组不同日军部队的一手文件，分别做独立测算，形成三组可交叉验证的结果。

第一组为日军第 13 师团 104 联队死伤

实录及推算。文章根据日军记录原文统计：该联队从1937年10月11日到1938年3月31日，共176天时间内累计阵亡589人、负伤1256人，合计死伤1845人；日军编制基准步兵联队定员3747人，师团定员战斗兵员20000人；该联队平均每日死伤约10.5人，对应师团平均每日死伤约56人；该联队6个月死伤率达49%，一整年死伤率达100%；按此基准推算，日军在华31个师团，一整年累计死伤约62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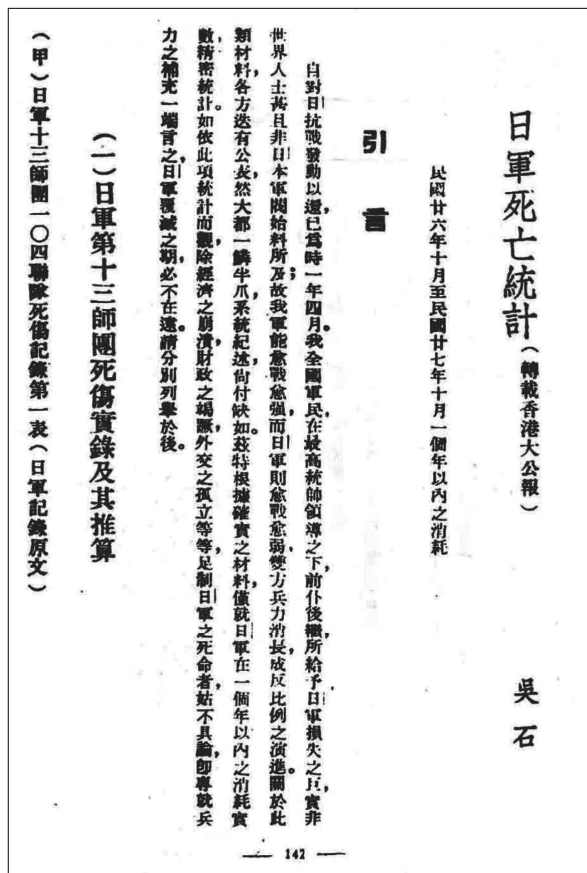
第二组为日军第6、9、101、106师团及波田旅团死伤病记录及推算。文章统计，黄梅、九江作战后，上述部队65.5天内累计死136人、伤3756人、病1421人，共5271人；平均每师团每日死伤病约80人；按此基准推算，日军在华31个师团，一整年累计死伤病约82.5万人。

第三组为日军第3师团第34联队第五中队伤亡实录及推算。文章统计，该中队1937年9月5日从吴淞登陆至1938年3月31日共208天，定员194人，累计损耗185人，7个月损耗率达95%；以此推算，该中队年均损耗率达163%；按此基准推算，日军在华31个师团，一整年累计总消耗约101万人。

综合三组测算结果，吴石明确断定：日军侵华一整年间，仅战场死伤一项已在60万人以上；若包含战场疫病、病亡、永久丧失作战能力的总消耗，已超百万。

最后，吴石自信地说：“故可断定日军侵华一年中死伤一项已在60万以上，其伤亡之大已超过1904年俄日战争二倍，循是以往，日军作战愈久，消耗愈大，襄襄岛国，其何以堪？最后之胜利，终属于我，无疑也。”

严格来说，吴石此文的推算统计方法



吴石《日军死亡统计》

并不科学，最后的数字也未必准确，但明确区分“死伤、死伤病、总消耗”三个统计层级，避免了此前统计中的口径混乱、数字夸大的问题。尤其是，此文以兵力消耗的量化数据为核心论据，直接驳斥了当时的“亡国论”，为持久抗战战略提供了坚实的数字支撑。此文先后被《大公报（香港）》《大美晚报》《工商日报（香港）》《工商日报（西安）》《西北文化日报》等多家报刊转载。值得一提的是，由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以外商名义创办的《时论丛刊》（第三辑）（1939年6月出刊）也转载了此文。同期杂志还刊登了周恩来、项英、陈毅、赖传珠、袁国平等中共和新四军领导人的文章，吴石文章能够被该杂志看中，说明文章的主旨和结论也得到了中共的肯定。

五

武汉抗战是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转为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在中国抗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传统的“八年抗战”历史叙述中，武汉抗战时期是重要的一环。吴石离开武汉后，常常回忆和怀念武汉，其相关演说、论著等也论及武汉和武汉抗战的重要作用。1939年7月1日，吴石在国民月会发表题为《抗战二年之检讨》的演说，分析抗战两年来之真实情况。7月6日，由国共两党协商合办的《救亡日报》分三日连载吴石的演说稿。

吴石在演讲中指出：现代“战争”两个字，已经不再是单指两国军队在战场上打仗的一回事了，现代战争是“全体战”，最少含有四个部门，即“武力战”“思想战”“经济战”和“政略战”。日军妄图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可是“自徐州会战至武汉会战，虽有长期战的准备，却仍未忘怀于歼灭战；尤其迷恋着‘速决’的幻想，这又被我举国上下一致的坚强的民族意识和热烈抗战情绪，二度三度的推翻，终至无从实现。到了武汉会战以后，如南昌会战，鄂北会战，晋南会战等，更只有加强着我军持久战的坚韧性，和在各战场上的形势从被动转作主动，而予以更重大的打击。”吴石最后的结论，还是中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1940年7月，全面抗战三周年之际，吴石撰写了《抗战三年之演进与最后胜利争取》一文，全面回顾和总结了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抗战情况，特别提及从全面抗战爆发到



吴石将军

武汉抗战时期日寇的速战速决战略及种种威胁策动，表面上看似取得了效果，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一时期，在表面上看来，敌人似乎有所获，实际上即完全不然，敌人于攻城略地长驱直入之下，不但在无数次的会战中未曾一举歼灭过我的野战军，反而被我持久消耗战拖得疲敝不堪，于是整个速战速决的战略，便在其自身武力与经济力的大量消耗之下，宣告失败了，而散漫的傀儡组织也只会成其累赘，经济的侵略所得不过军用票与一老头票相互的“交换”“交割”而已，外交上也徒增加列强的忌妒磨擦，而潜伏新的危机。

吴石进一步指出：“到了武汉被占以后，战事仍旧无法结束，敌人既感自己国力的衰

退，民心士气的消沉；更以我后方战斗力斗志愈益强韧，乃转而采取远和近结的策略，企图以政治的、外交的手段，一面诱我降服，一面迫使列强退让，以达其最初的目的。”在这里，吴石实际上是肯定武汉抗战也让日本“速战速决”的幻想破灭，转而走诱降道路。最后，吴石还是自信地表示：

从三年来战争的演进，我们看到了倭之谋我，虽然无微不至，穷极凶狠，而终不能屈服我，反使其内外危机愈益深刻，这便是由于我之天时、地利、人和占有的优势，和能够充分的发挥，遂陷倭于如在热锅上的蚂蚁般左冲右闯，无以自拔。质言之：我国此次抗战要立不朽之业，成最后之功，而彪炳于世界，流芳千万祀者，全凭我固有的天时、地利和人和之发扬，而于近代战争中，最关键所在尤为精神之制胜，人和之得利，这是我们抗战三年的独特成就，也就是争取最后胜利的最大动力。

吴石的演讲和文章，系统总结了抗战二、三年来的得失，充满了“全体战”和“持久战”的思想，坚信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是国军高层参谋体系少见的系统化持久抗战论述。1940年9月，浙江省动员委员会战时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编辑出版《抗战三周年》一书，收录了蒋介石、何应钦、陈诚、薛岳、陈绍宽、周至柔、王宠惠、孔祥熙、翁文灏、郭沫若、张其昀等人的相关文章，也收录了吴石《抗战三年之演进与最后胜利争取》一文。在这一批作者中，吴石的官衔、职务最低，足见其个人影响之大和文章质量之高。

武汉抗战时期，是吴石军事、政治生涯中的一个特殊和重要时期，为时虽短，但是对其政治选择和人生道路影响极大。武汉抗战前，吴石福州同乡及好友、第一战区司令

部高级参谋室主任何遂，在南京把吴石引荐给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中共代表团成员，让吴石初次接触中共。武汉抗战时期，第二厅在珞珈山举办“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吴石主持并特邀周恩来作形势报告、叶剑英讲授《游击战争概论》，对其影响很大。

1941年，何遂完成画作《长江万里图》，吴石在画作上题诗多首，其中《长江万里图·武汉》写道：

武昌夏口大江流，廿二年前忆旧游。
几度探幽攀古阁，也曾寻醉踏芳洲。
孤心郁勃凭双剑，共济安危托一舟。
楚客江蓠无限感，秋风斜日更添愁。

《长江万里图·武汉》诗文气势磅礴，直抒胸臆，“武昌夏口大江流，廿二年前忆旧游”说的是1919年吴石与何遂在反对福建军阀李厚基的护法运动失败后，结伴北上逃亡路过武汉的往事；“孤心郁勃凭双剑，共济安危托一舟”则是吴石和何遂二人的情谊写照。

1947年，经何遂与其第三子何康全程安排，吴石在上海锦江饭店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刘晓、张执一等领导人秘密会面。这次会面后，吴石正式接受中共领导，成为代号“密使一号”的核心情报人员，开始了参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光荣历程，并为此献出宝贵生命。

邓正兵，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
任泰宇，江汉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

《奏办湖北武汉劝业奖进会报告书》前言

——“武汉劝业奖进会二题”之一

◇ 涂文学

1909年10月28日至12月12日（清宣统元年九月十五日至十月三十日），武汉劝业奖进会在武昌武胜门外临江官栈举行，这是我国最早取法欧美博览会范式举办的国内最早、最规范的近代博览会。会后编纂的《奏办湖北武汉劝业奖进会报告书》和《武汉劝业奖进会笔记》，对于武汉劝业奖进会举办缘起、宗旨、展会组织和规模、展品类型、获奖展品等都有具体介绍。为保护和传承史料，并为当下会展产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武汉出版社大型出版融媒体工程《武汉文脉》拟影印出版二书，将于年内出版。出版社惠约拙笔，撰写二书前言，系统介绍二书出版缘起、具体内容、史料价值及现实意义，现应《武汉文史资料》之约，先行发表，以飨读者。

晚清海禁洞开，欧风西潮裹挟商战席卷华夏，国势日蹙，朝野上下莫不思振兴实业、培植国货以纾困图强。张之洞督鄂十数载，大兴洋务，广兴制造，“开风气而劝工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业之两湖劝业场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之商场。宣统元年（1909年），湖北承新政余绪，举办武汉劝业奖进会，为晚清内陆省会举办时间最早、最为规范化的近代地方性博览会。一时万众瞩目，观者如堵。盛会落幕之后，一应公牍、清册、规制、纪闻汇纂成帙，即《奏办湖北武汉劝业奖进会报告书》，另有精简流通本《奏办湖北武汉第一次劝业奖进会一览》同时刊行，为梳理晚清实业转型、近代会展制度萌发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一手资料。

武汉劝业奖进会原定于宣统元年四月

初一日（1909年5月19日）开幕，但因“事属创举，物品毫无统计之可查”，筹备不及而延至九月十五日举行，迄十月三十日闭幕，前后凡四十五日（1909年10月28日至12月12日），会场择武昌平湖门外临江官栈（乙栈），区位得江河之便，格局开阔，布置井然。其立会宗旨，“开辟会场，罗列品物，供人观览，俾作师资。故其美术日精，新理日辟，为计学之要素，作商战之先河”。彼时洋货充斥市场，本土手工业因循守旧，不思革新，商界尤对会展认知闭塞，“商情向来涣散，商民对于官府举动常多误会，今虽略知赛会之利益，仍恐将信将疑，观望不前”，导致利源不断外流。鄂省创设此会，意在聚合全省56州县物产，并延揽直隶、上海、湖南、宁波等省外商品参展，以陈列相较优劣，以品第激励革新，以宣讲启迪民智，“商智日进，而商业亦日益发达”，为工商业发展破除观念桎梏。

武汉劝业奖进会组织架构，取法近代欧美博览会范式，又贴合晚清政治与社会实情，设总办、会办总揽全局，下设总务、调查、陈列、评议、庶务、宣讲六科，权责清晰，各司其职；复吸纳武汉商会、教育会及地方绅商组建协赞会，其中展品审查员商会代表占比颇大。武昌商务总务推选8人，汉口商务总会推选12人，两个商务总会的总理并出任审查长，构建官绅协同、朝野并举的筹办格局。会务章程纲目周全，机构及职责、经费筹措与使用、展品征集、场地划分、陈列分类与规范、评议标准、奖惩等级皆有成文定则，一改传统乡土物产集会散漫无序之旧观。

本次参会商号逾千家，展品总计8800余种，既直观展现荆楚农工物产的原生风貌，亦清晰显现近代新式工业萌芽的时代印

记。赛事品评恪守务实准则，摒弃猎奇尚古之俗，以工艺革新度、实用价值、市场潜力为评判标尺，分两次核定五等奖项，择优公示，褒奖先进。此次劝业奖进会筹备与举办，不仅有效改善湖北本土实业风气，更为次年全国性南洋劝业会提供完整制度参照与优质展品储备。

武汉劝业奖进会形成了卷宗浩繁的各类纸质文件和实物档案，湖北地方当局有鲜明的档案保存意识，展会甫一结束，即指派专人开展系统整理与编纂，于是有《奏办湖北武汉劝业奖进会报告书》出版行世。是书于奖进会当年由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以石印线装刊刻出版，虽无作者署名，但学界一致认为纂辑者当为张廷海。

张廷海曾为湖北劝业道职员，在《奏办湖北武汉劝业奖进会报告书》中，其个人信息至少出现两次，一为“职员之委任”目“职员一览表”中“职务 文牍员 姓名 张廷海 官阶 廪生”；一为“经费决算”目“职员津贴数目表”中“文牍员 张廷海 二十两”。可知其在劝业奖进会负责文牍工作。劝业奖进会结束后，湖北省劝业道委责其编纂报告书当为应有之义。

张廷海供职湖北劝业道署，长期执掌物产调查、实业文牍与奖进会文件撰写及典册整理，深谙近代赛会体系与官方文书体例，全程深度参与劝业奖进会各项事务，其汇总劝业奖进会奏章札文、往来公牍、章程条例、展品清册、评奖底簿、经费账册、宣讲文稿等一手原始档案，统筹体例，删汰繁冗，规



整篇目，最终修成详、简两个版本，即除详本《奏办湖北武汉劝业奖进会报告书》外，另有简本《奏办湖北武汉第一次劝业奖进会一览》删繁撮要，留存制度大纲与会事核心，便于向各省官署、商会流转观摩。

《奏办湖北武汉劝业奖进会报告书》原版均为线装竖排石印，计310页，版式规整，文字未经后世篡改附益，保有旧籍原生样貌。历经百年战乱流转，原刊完帙存世稀少，公私藏本多有残损，学界长久依赖二手转述，讹误缺漏屡见不鲜。直至2021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以馆藏宣统元年（1909年）石印足本为底本，将报告书全文影印收入《近代博览会资料汇编》，这部珍贵文献才得以完整面向学界开放，填补了长期以来的史料空白。

《奏办湖北武汉劝业奖进会报告书》卷首刊印照片30帧，包括湖广总督陈夔龙、瑞澂、护理湖广总督杨文鼎及劝业奖进会总办、会办、参议、坐办等官员肖像以及劝业奖进会职员合影、开幕式纪念、颁奖典礼现场情景、奖进会会场设施景观、各部参展展品及上海馆、湖南馆、直隶馆、宁波馆、汉阳钢铁厂特别室、陆军工作厂特别室等特别展室展品等。正文未分章节而列33目系统介绍劝业奖进会缘起、章程、组织机构与职员委任、宣讲宣传、展品采办及税厘优免、会务、会场布置与安保、展品审查（奖品评审）、开幕式与颁奖典礼纪事、经费决算与收支明细等等。

从陈夔龙“札劝业道暨官钱局总办飭办劝业博览会”，到“武汉劝业奖进会开会督院陈训词”“武汉劝业奖进会开会总会办演说词”及开幕式北洋大臣、北洋特派参观员等贺词，再到“武汉劝业奖进会改订章程”；从劝业奖进会总办、会办、参议、坐办及各

类职员名册，到汉口出张所地址、出张员姓名、职责与劳绩乃至“于各街巷分段雇定之代书人”为参展者代书参展文书“每一出品人取资百钱”之酬劳规定；从“陈列之规则”规定五部“陈列员”职责及与参展者（出品人）之关系，到会场门外所设“派有搬运夫，专伺运船傍岸，为之舁入”“商人出品，自照料所至会场”且“往返数次，不费分文，颇称便焉”；从“武汉劝业奖进会出品规则”规定奖进会展出品分甲天产品、乙工艺品、丙美术品、丁教育品、戊古物品5种35类，到《出品志》详载天产部各类展品372件及出品人86人、工艺部3512件及出品人627人、美术部564件及出品人184人、教育部941件及出品人156人、古物部1137件及出品人154人，计6526种，1207人；从“审查及奖励规则”制订评审及奖励规则、“审查之组织”公选审查员和特别审查员评审参展品获奖等次，到“奖励”一目中“奏办武汉劝业奖进会及第题名录”公布1等10项、2等19项、3等39项、4等46项、5等75项，再到颁奖典礼盛况实录乃至奖牌形式和褒奖状式展示；从“会计之组织”规范劝业奖进会财务制度，到“经费决示”收入35730.62两、支出35730.56而达到收支基本平衡；从“游览规则附买物须知”规范游客顾客参与购物行为，到不同“特别券”、“循环券”、“研究券”、“普通券”等不同类型的入场券的发放与出售，乃至上述入场券式样品展示等等。凡此种种，充分显示出武汉劝业奖进会办会目标清晰，顶层设计周密，章程制度健全，组织管理规范，会务安排有序，等次评审公正，虽为近代中国首次举办之商品博览会，但其正规化、规范化程度，与当时西方各国近代博览会相比该不遑多让，即使以当下会展视角来看亦毫不逊色。



武汉劝业奖进会的规范化，乃是从《奏办湖北武汉劝业奖进会报告书》编纂体例规范、内容全面、资料详实体现出来的。纵观全书，此书史料价值厚重独特，无可替代。

其一，完整定格张之洞新政收官阶段湖北工矿、农林、商贸、手工业的整体发展样貌，为研究晚清华中内陆城市早期现代化转型留存系统、详实的实证依据，可补地方志与人物文集记载之疏漏。

其二，所载全套赛会组织架构、展品分类、评审体系、经费运营、官民协作模式，是中国近代地方博览会首个成熟制度范本，直接影响南洋劝业会顶层设计，厘清了中国近代会展事业早期演进的完整脉络。

其三，海量展品名目、工艺特征、改良记录，忠实还原晚清中西技术交融、国货改良的真实图景，是近代物质文化史、近代科技东传史、手工业发展史不可或缺的原始素材。

其四，书中社会宣讲、公众观展、市井风气转变等细节记载，如武汉商界从对奖进会“将信将疑，观望不前”到“绅商踊跃，各出物品，届期送会”，清晰折射清末城市公共空间形成、市民意识觉醒、社会结构缓

慢嬗变的时代大势，兼具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多重研究维度。

以当下视角审视百年旧籍，其承载的精神内核与实践经验依旧具备深刻的现实镜鉴意义。书中奖掖工艺、振兴国货、鼓励改良、互通商贸、开启民智以求自强的核心理念，与当下实业兴国、非遗活化、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的时代方向高度契合；其官民协同、开放包容、兼容新旧、博采众长的办会思路，可为现代会展

经济建设、区域商贸联动、地域文脉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提供本土化历史参照。典籍所载荆楚物产丰饶、技艺绵长、实业求新的历史底蕴，是湖北地域文化塑造、乡土文明赓续的源头活水；而整场盛会背后破旧立新、务实精进、敢为人先的荆楚风骨，亦为当下区域高质量发展、持续开拓创新提供绵长不绝的精神滋养。

一场地方劝业盛会，是晚清国运与社会转型的微小缩影；一部档案汇编典籍，是近代经济转型与会展发轫的真切物证。《奏办湖北武汉劝业奖进会报告书》，以质朴严谨的文字存一时典章，记一世风物，让百年前荆楚实业维新的探索轨迹得以鲜活再现，长久存续。今整理旧本、重新刊印，意在循史料脉络洞悉社会与经济转型之规律，感知地域文化精神之特色，体悟中国式现代化之要义，踵事增华，守正创新；以史为鉴、笃行致远。此即本书影印重刊之旨趣。

涂文学，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4/1931：武汉防汛老照片

◇ 侯红志

1954年，武汉遭遇特大洪水袭击。武汉关水位从6月25日起突破26.3米警戒水位、7月12日突破28米，8月18日上涨至29.73米最高水位，武汉防汛经历37天。在此期间，堤防虽然险情不断，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武汉人民战胜了特大洪水，保证了全市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1954年12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党领导人民战胜了洪水——一九五四年武汉防汛画册》，详细记载了武汉人民在建国初期的这一波澜壮阔的防汛抗洪史实。

1931年，武汉也曾遭受特大洪水冲击，全市惨遭淹没受灾严重，国民党政府当局“湖北水灾急赈会”也拍摄了一组照片，反映了当时的基本状况。

本文依据上述两种影像资料，结合《武汉通史》《武汉市志·民政志》的记载，还原两次武汉防汛抗洪的不同情景。

1954，众志成城保平安

1954年，长江上中游相继出现洪峰，干流各站的峰顶水位都超过历年同期的记录。8月18日，江汉关水位涨至29.73米，在洪水的严重威胁下，武汉市区安然无恙。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市防汛总指挥部总指挥王任重（右四），主持研究加强防汛抗洪的布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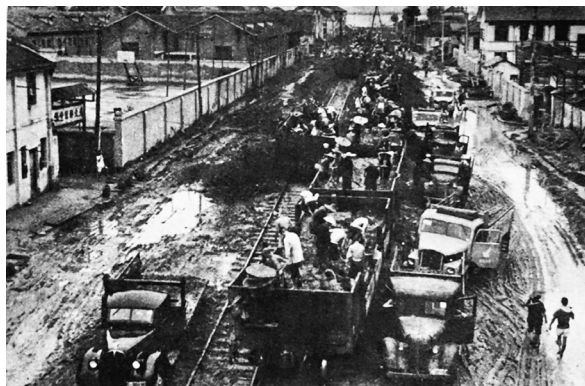
从6月27日起，武汉全面开展防汛抗洪，工人、农民、解放军、学生和干部近29万人走上大堤。汉口上海路邮政管理局前，人们欢送开赴前线的防汛抗洪战士。



武汉部队积极投入武汉防汛抗洪斗争，战士们出发时宣誓：“坚决战胜洪水，为确保武汉地区的国家建设和人民安全而斗争！”



中央和各地调来各类工程技术人员和发电、扫灞（束水工程建筑）等专业技术人员前来支援，海军潜水员乘飞机到达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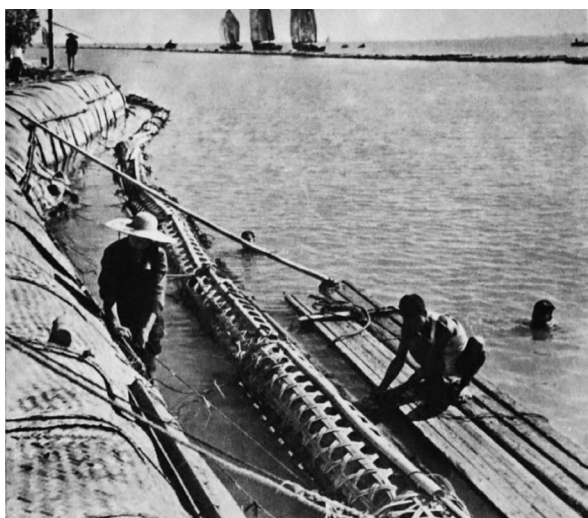
防汛抗洪期间，仅从数十里外的黄陂浠口、祁家湾等地运来的土方便有270多万方，若装上火车可从汉口排列到北京。



洪水几次将加高的路基淹没，荣获一等红旗奖的江岸机务段 3352 号机车叶文汉包乘组，在水位高出路基边缘一公尺的铁轨上涉水而行。



抢险队员在张公堤岱家山闸门处，紧急抢修风浪冲击造成的大洞。



全国支援武汉抽水机 273 台，在两个月零 5 天排出的水量，全国 6 亿人口人均可挑 4 担，使滞水淹没的农田全部露出水面。更有 1000 多辆汽车、72 艘轮船、32 个火车头及 2419 个车皮，拉来 543 万条麻袋、303 万个草包、190 万斤芦柴、26 万根木料。芦席护堤坡，竹笼护堤脚，木排防浪，组成三道防线。



136 公里长的堤防全面培厚加固，普遍加高到 30.5 米以上，并在堤外铺设长达 62.4 公里的防浪木排。



中央大力为武汉调拨物资，充分供应粮、油、盐、煤、肉、布和日用百货。一度供应困难的蔬菜也由各地支援，太原的包菜、内蒙古和东北的土豆、四川的榨菜、江西的冬瓜、江苏和浙江的雪里蕻，以及蛋品、豆制品源源不断运来，每日上市的品种跟平日相差不多。



载重汽车川流不息，把大米和面粉运到全市 180 个流动供应站。在郊区滞水地带和堤防线上，国营商店和合作社的 1300 多名工作者挑着货郎担、推着手推车和三轮车、驾着小船送货。武汉物价始终保持稳定，生活供应保持正常。食品厂工人包装面包点心，运往堤上供应防汛抗洪战士。



群众一旦遇到滞水受灾，干部出动帮助搬迁转移。



长江水位回落到警戒线下后，武汉防汛总指挥部召开总结庆功大会和武汉各界追悼防汛救灾死难烈士大会。在防汛斗争中牺牲的烈士共有 89 位，其中严忠良、贾明武、易金元、李志林、陈海清、李家信 6 位烈士被迫认为一等功臣。



10 月 1 日，在庆祝建国五周年的游行行列中，3000 名防汛抗洪战士代表 29 万大军，展示各种图表汇报战绩。

1931，一片汪洋成泽国

1931 年 7 月 23 日，江汉关水位 26.48 米，省市当局及有关单位曾采取封闭沿岸码头闸口、堵塞下水道出口等办法抢护，但“衔石填海”终归徒劳，沿江街道及市内低洼地带多处被淹，江汉关前一片泽国。



28日（水位27.15米）晨6时，分金炉堤先溃，下午3时许邻近子堤崩倒十余丈，经围堵附近铁路口并在和记蛋厂侧加筑土堤挡水，暂未波及下游市区。29日（水位27.21米）晚11时，丹水池美孚油站附近铁路103段（67号电杆处）路基冲破约二丈，连夜以巨石和麻袋装土抢护。翌晨5时许，复溃七丈（一说26米）。



30日（水位27.12米）10时许，丹水池决口。随后，溃口下约半里的105段（45—46号电杆间）铁路岔堤又决一大口，宽约260米。江水长驱直入，奔流后湖。至此，刘家庙、循礼门、中山公园直至硚口，铁路以北约三十里地尽成泽国。中山公园大门被大水封闭，协和医院淹及屋顶。

8月1日，作为市内第二道防线的铁路路基，在上下单、双洞门等处均呈险象。2日上午，上单洞孔（老法院背后与由义路相



交的铁路孔）严重渗漏，下午5时30分大段路基倾倒，水势汹涌冲入，各马路及中山马路均水深三四尺，铁路边棚户水及屋檐。老法院附近的汉口慈善会（今中山大道市第一医院院属建筑）被淹。市区十有九水，舟通里巷。



7日起,风雨交加,风助水势,水位激增。12日,川、襄水头并至,汉口市区视为最后防守重点的皇经堂堤和川汉铁路路基岌岌可危。16日晨6时半许,皇经堂堤下段溃决,太平洋肥皂厂后的铁路路基亦崩溃。至此,汉口全部陆沉。济生马路(今民主街)的汉口市政府、自治街圣若瑟女校(今武汉市第十九中学)门前犹如水巷。

据《武汉通史》记载:在情况告紧、市民辗转上报之时,身为湖北省政府主席的何成濬和督军徐源泉、警备司令夏斗寅,却在某处与既济水电公司经理刘少岩一起打牌。何成濬等闻讯后漠然视之:“不要紧,看着办吧。”后有地方商绅高重远等人向南京政府控告何成濬,指其为“绥靖无方,防洪失职”“熟视无睹,依然游宴如故”,政府不顾人民,正是天灾加人祸。



丹水池铁路路基溃决后,灾民大部移至铁路路基及张公堤上栖身。继而单洞门路基及皇经堂滩堤溃决、川汉铁路路基漫溢。灾民无处安身者,只得麋集于汉阳赫山、梅子山、龟山等高地,风餐露宿,死里逃生。临时收容所简陋,灾民表情无奈。

汉口总商会(湖北水灾急赈会设于此)为了募捐救赈,向全国发出通电称:“堤防尽溃,人畜漂流,田庐荡析,浮尸蔽江面,



人立半山巅”“滔滔江汉,白浪掀天,平日繁华,付诸东流,生机断绝,祸等陆沉,灾民麋集,垂毙奄奄”,描述了百姓遭受灾难之惨状。张美之巷口(今中山大道民生路口)的汉口总商会,自身也淹在水里。

据当年的湖北省年鉴记载:武汉三镇受灾面积计321平方公里,其中汉口79平方公里,武昌215平方公里,汉阳27平方公里;被淹农田共91847市亩,其中汉口12930市亩,武昌65477市亩,汉阳13440市亩;三镇受灾人数共636683人,其中汉口566864人,武昌24719人,汉阳45100人;死亡3619人,其中汉口3515人,汉阳100人,武昌4人。

侯红志,退休前为武汉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

“荆楚雄风”背后的鲜为人知

◇ 韩少斌

晴川阁屹立于汉阳龟山东麓的禹功矶之上，扼长江与汉水交汇之咽喉。禹功矶，这块伸入江心的巨石，相传大禹治水曾在这里“疏江导汉”，奠定了“江汉朝宗”的壮丽景观。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为铭记大禹功绩，在此修建了禹稷行宫。明嘉靖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1547—1549），汉阳知府范之箴修葺禹稷行宫时，又紧邻一旁修建了晴川阁。

1985年，现晴川阁按清光绪年间式样重建，发现了一批碑刻，其中有现禹碑亭中东侧的“禹碑”和禹稷行宫门外的“荆楚雄风”碑，以及晴川阁花园中的“禹碑真伪辨”残碑。非常遗憾的是，对它们的研究未能深入进行，甚至对“荆楚雄风”碑的介绍，30多年来一直认为是“荆南观察使者李振义所书，

碑文意为赞扬荆楚民众与洪灾水患顽强拼搏的精神。”

武汉民间文史研究者牛新民曾在汉网论坛“人文武汉”发起讨论并论证，将其摹、



清末晴川阁



晴川阁“荆楚雄风”碑

书、撰者锁定为四川犍为县人李拔。笔者曾参与讨论，并在2017年春向晴川阁管理方反映有关意见。不久，李振义更正为了李拔，但前缀仍用“荆南观察使者”。至于李拔是什么人，做过什么事，特别是与武汉有过什么关联，为什么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留下这三方碑，鲜为人知。为此，本文通过文献考察试作一些探寻，力求有所释疑。

自述“在楚北尝三任县令一佐郡”

从现有的历史记载来看，李拔从未用过李振义这个名字和别号。李拔，字清翹，号峨峰，生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卒于乾隆四十年（1775）。犍为县文庙旁有条街叫“文林街”，因出了李拔及其子孙“文人如林”而得名。李拔及其子李元模、孙李锦源和李宗濂“一门四进士”，并有八人出任知县，人才辈出。如今李拔纪念馆建在文庙景区内，是李拔生活过的地方。

李拔系唐太宗第七子蒋王李恽的后裔，年幼时家境艰难，耕而不废读。其母周氏为让李拔交得益友，挑选街坊中品学兼优的学

子与其会课，典当簪子以招待学友。李拔18岁那年考中秀才，其父李汝璋教导说：“为学如登山，徙峨眉之巅则视下矣。倘一徙而止，犹未登耳。”李拔因此取号“峨峰”自勉。父母的教诲让李拔终身受益，31岁中举。乾隆十三年（1748）会试未中，任景山教习。乾隆十六年（1751）再试，38岁中三甲进士，以知县用。他一生好学，工作之余书稿不离身，著述颇丰，撰有《重修犍为县志》《长阳县志》《福宁府志》等。

李拔虽为四川人，为宦二十余年，但对荆楚大地并不陌生。在《福宁府志序》中，自述“曩者余在楚北尝三任县令一佐郡”；在收录的《郡守峨峰李公去思碑记》中，有“历任楚之钟祥、长阳、江夏等县，俱有声。不数年间晋秩司马，寻擢太守”之句。乾隆十六年，李拔初为地方长官，就署湖北钟祥知县，不久“补长阳县，性明敏，善诉讼，筑城垣，以能擢江夏令”。

李拔在长阳兢兢业业，修补城垣，修建道路，利乡济民不稍怠。长阳县城四路四坡山陡路窄、行旅艰难，李拔“捐廉”修建四路茶亭并安排人经营。乾隆十九年（1754），李拔在江夏不到一年，升为“佐郡”。据《峨峰府君行述》转载，李拔确任过汉阳府同知，其中一则故事说李拔赴汉阳就任途中，有人欲行贿，李拔道：“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物何至于我哉！我费即缺，岂受此暮夜金。汝速持归，稍迟，且拿究矣”。可见李拔赴福建之前，长达七八年在湖北为官，在武汉亦有数年。

自喻“榕为大木，犹荫十亩”

李拔作《神石入梦》一词称，“戊寅之秋，予在汉江，梦游海滨”“闻报擢守福郡



四川犍为县李拔纪念馆前塑像

太守”“郡治风景与梦中所见无异，始信事由前定，良非诬也，诗以纪之”，谈到在汉阳梦见大海，不久相继调任福宁、福州知府之趣事。

习近平总书记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曾到霞浦县考察，特地找来李拔编纂的《福宁府志》研读。1990年10月，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在一次全市造林绿化工作会议上提到：“清乾隆福州知府李拔曾把做官与榕树作对比，他说，‘榕为大木，犹荫十亩’，为官者‘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封建官吏尚且能这样，作为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应如此。”

榕树是福州市的市树，根深叶茂，独木成林，能为万千生灵遮风挡雨。李拔以此自喻，生动形象诠释了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中的“民本”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段话，不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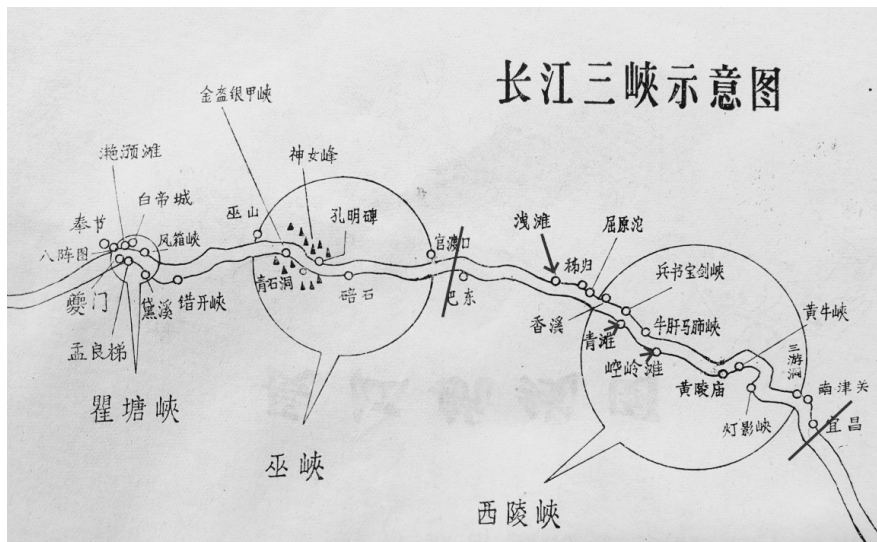
是对李拔个人的肯定，更是在新时代赋予新内涵，将之提升转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

李拔在福建，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也是他“造福一方”理念的最佳实践场。乾隆二十四年（1759）春，他在福宁知府（府治在今霞浦县）任内“修城垣、建桥道，筑三坝、禁停棺、劝农桑、课书院”，首开当地种玉米棉花、种桑养蚕先例。勤政备至，深得民心。二十五年（1760）五月，以“善最”旋调福州，福宁百姓扶轿挽留，立“去思碑”颂德。一度流传“两郡争守”的佳话。在福州，李拔仍倡农桑，广种树木、蚕豆等，颇有政绩。当地七夕节前收蚕豆后，吃蚕豆、话家常、消旧怨、结友情的习俗，就与李拔有关。二十七年（1762），李拔因慈严相继亡故，丁忧回籍离任。三十一年（1766）四月起复，六月任长沙府知府。

自励“铸得秦鞭驱海底”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李拔刚正不阿、不善变通、不事交结，为官场世俗所不容，从此命运多舛。乾隆三十三年（1768）二月，巡抚方世俊以不宜首府为由，免其首府暂署衡州知府，十一月又署永州知府。三十四年（1769）三月，新任巡抚兆麟以任事勤干，给咨送部。六月，署岳州知府。一度署理湖南驿盐长宝道。三十五年（1770）四月擢升湖北荆宜施道员。

宜昌三游洞前室第一石柱柱壁上，有“造物同游”四个大字，是李拔书于“乾隆庚寅嘉平”。三峡峡江两岸，还有他的大量题刻，如巴东“楚蜀鸿沟”“楚峡云开”“化险为夷”，秭归“宏开利济”“雷鸣洞”“路



别云泥”“香溪孕秀”“安怀楚甸”和七绝诗二首等。其中大部分书于“乾隆庚寅嘉平”，指的是乾隆三十五年腊月。这一年，李拔升任荆宜施道员兼管水利，带队勘察三峡航道，整治暗礁险滩，修筑栈道等，疏浚三峡航道。

三峡之险以西陵为最，李白所写“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不过是以浪漫主义描绘遇赦回家的大好心情，而不久前他在过西陵峡黄牛滩时，曾发出“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的叹息。李拔在黄陵庙写下《黄牛山》诗四首，“铸得秦鞭驱海底”，表达其凿石平江的壮志。他在《凿石平江记》写道：“大江发源于岷山，汇西蜀百川之水，尽入夔峡以出汪洋，迅疾势如奔马。瞿塘滟滪之险，世所绝称。而入楚为龙，甚楚。自巴东归州以至东湖，拽新滩、空舸、三珠、鹿角、虎牙等处，寸节皆滩。□岩怪石，急湍横流，舟行触之，无不立碎覆辙，相循接救无术。其为生民之患久矣！”两年间，他“亲□履勘，设法筹画。去危石，开官[石曹]，除急漩，修纤路，凡施工廿余处，群工雨集，万斧雷鸣，两冬之间，顿有成效。”终于“抽

薪釜底，庶静洪涛，舟航永奠，毋负成劳。”

而在“乾隆庚寅嘉平”前三个月的禹稷行宫，李拔菊月（农历九月）书写“荆楚雄风”，孟冬（农历十月）撰毕“禹碑真伪辨”，仲冬（农历十一月）临摹“禹碑”。这一年，李拔因任乡试恩科监试来到武汉，也是他治理三峡西陵峡段

的第一年。可以联想，他家在四川，多次往返峡江，且在长阳为官两载，对三峡现状和未来艰险十分了解。他在衡州亲眼见过禹碑并购得旧拓，在《禹碑真伪辨》中对金石学的一大公案，提出自己的考证和翻译，并依旧拓临摹刻于此，以便永久流传。

李拔“荆楚雄风”四字笔力遒劲，是对大禹治水精神的崇高礼赞，是对荆楚民众同洪灾水患顽强拼搏的热情讴歌，也是对即将主持疏浚峡江的决心表达。

自用“荆南观察使者”

李拔终其一生，曾5次得到乾隆皇帝召见。居官抚政，以爱为心、以严为用、以勤为主、以俭为尚。李拔常言：“酷吏不可为，姑息亦养奸。苟不勤，恶能治；苟不俭，恶能廉”。

李拔为官勤勉，书法功底也颇为深厚，所题石刻除上述三峡、宜昌三游洞、汉阳晴川阁之外，还有长阳观音阁“慈航普渡”“普陀概胜”及白石桥“白石雄关”、长沙《自卑亭铭》等。特别在福建两地更多，如：福州鼓山“云程发轫”“毋息半途”“欲罢不



晴川阁“禹碑”

能”“登峰造极”“声满天地”“石鼓名山”“洗心台”“寻乐处”、于山“月朗风清”“丹井流香”、乌山“望耕台”“题望耕台”、南台岛“龙江飞渡”等。还有马尾“砥柱回澜”、连江“海阔天空”、福宁宁德白鹤岭“鹤翥鸾飞”“沧海一粟”、霞浦建善寺“春满南天”“比礼比乐，序宾序贤”和长溪河“长溪河源”等。在署名上，多用郡守、剑南、荆南观察使者、西蜀，下为李拔或峨峰。

从署名上看，李拔喜用古官名替代现职，荆南观察使即是如此。荆南原是唐、五代方镇名，唐置荆南节度使，后降为荆南观察使，北宋初废。五代十国时期，高季兴所建南平政权又称“荆南”，辖境荆、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州等。观察使全称为观察处置使，地位次于节度使。宋置诸州观察使，仅为武臣虚衔，明初不再设立。

明朝行省“承宣布政使”下设分守道，湖广有“武昌道”“上荆南道”“下荆南道”

等。这些道员均由布政司的参政参议兼任，仅为催办公事。清代地位上升，成为凌驾于知府、知州等地方官员之上的一级官员。清康熙九年（1670）置上荆南道，驻荆州府。雍正十三年（1735）更名为荆宜施道。管辖荆州，宜昌，施南（今恩施）等地，与古代荆南辖境大部相重叠。黄陵庙《凿石平江记》上记有李拔完整的官称：“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湖北分巡上荆南道、统辖荆宜施等处地方、兼管水利事，随带加三级、纪录四次。”

“荆南观察使者”并非清代正式官名，只是官吏雅称，晴川阁对“荆楚雄风”碑的介绍使用这一表述是不全面的，不能展现李拔治水的完整事迹与形象。

武汉因水而兴，亦因水而患。1931年全城被淹的惨剧，曾是这座城市的伤痛记忆。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先后战胜1954、1998年等多次特大洪水，铸就“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伟大抗洪精神。从神话传说到历史现实，在禹稷行宫这片被大禹传说浸润的土地上，有宦迹于此的李拔，有生长于斯的李本忠，有隐逸于此的毛会建，与武汉人民一起共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治水史诗。

韩少斌，武汉奥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我在汉正街长大（四）

◇ 李胜洪

同学家开的各色店铺

汉正街有些店铺特熟悉，因为都是同学家的产业。紧靠杨家大巷的胡春记成衣店，是小学同学胡友芳家开的，门面大而深，衣服琳琅满目，是硚口这一带比较大的成衣店。长钰文具纸张店开在崇仁路口，是初中同学张本源家的店铺，除了经营文具用品，还兼营鱼竿钓具和出租小人书。万国栋同学家开的是牙科诊所，门口两扇玻璃门上印着亮眼的口腔牙齿彩绘。牙科医生是个很好的职业，可惜万国栋同学没有继承下来。龙茗茶庄开在义烈巷口对街，门面宽敞气派，内中整洁亮堂，陈列各地名茶，给人以气韵高雅的感觉，这是龙梅芳同学家的产业。

刘耀凡同学家开的煤球店，那时叫炭圆铺，临街虽没有亮眼的门面，但丝毫不影响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它居首位，煤球几乎是日常生活中的唯一重要能源，一直凭票计划供应。回想起来，他家的煤球店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5岁左右那年，我家住在安定巷5号楼上，靠西边的窗户正对着煤球店的后院，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好奇心驱使我经常看煤球的制作过程，看他们怎么把地上的小方块煤撮入一个大簸箩里面，慢慢摇成煤球的，这个场景至今难忘。后来，生活中实践证明，手工煤球比驴粪蛋样的机

制煤球熬火经烧。后来蜂窝煤出现，手工煤球因劳动强度大且产量低，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吆喝声中的行商走贩

“卖报！卖报！《长江日报》《湖北日报》”这是那个年代汉正街人非常熟悉的吆喝声，每天早上，一个30多岁高高瘦瘦的中年人，背着满装报纸的帆布袋，胳膊弯夹着一摞报纸，从集家嘴沿汉正街往硚口方向走，边走边吆喝。他行走匆匆，一边叫卖，一边向老订户的铺面投递。一年四季，无论寒冬酷暑风雨雪天，他风风火火的身影都会按时出现。他的吆喝声音洪亮，很有特色，也可能是听多了的原因，至今难忘。

“卖印……色油来！”这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轻声秀气拖着黄陂口音的娘娘腔吆喝。这样的声音出自一个男人的口中，无疑引起人们的好奇。只见他头发中分，眉目清秀，皮肤白皙，身材中等偏瘦，手挽一个用布盖着的篮子，慢步略显扭捏地行走街头。经常有小孩跟在后面学他的吆喝声，他也不恼，顶多骂一句，然后继续走着舞台上旦角的碎步。正因为这样，人们把有娘娘腔的人就称为“印色油”。一度传说他是国民党的特务，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烧焦补锅呢！”循着吆喝声可以见到一个师傅在忙碌，左边一个圆筒式的小风箱

拉得呼呼响，中间一个小火炉焦炭烧得火焰泛蓝，炉子上有一个小坩埚，里面是熔化了铁的铁水。师傅左手拿一块耐高温的石棉布，右手用小铁匙取一点滚烫的铁水放到布上，堵在铁锅破损的下面，右手再拿油浸过的布筒上下挤压，铁锅就补上了。我初中同学程常怀毕业后，曾有一段时间从事这个职业，现在这个行当随着时代的变化已经消失了。

“卖八卦肉！”一个50多岁的老者身材瘦削矮小，篮子里装着杀好了的乌龟肉和一把小秤，边走边吆喝。八卦肉就是乌龟肉，当时民间对乌龟还是蛮敬畏的，认为它是长寿的吉祥动物，有龟鹤延年的说法，所以对杀乌龟卖多有不齿。当然，也有人认为八卦肉是滋补上品，还是有生意可做。

“补碗呢！”那个年代，人们生活都非常节俭，打破了碗都舍不得扔掉，这样就有了补碗的行当。补碗师傅把破损的碗片用线绳固定好，再用一把小金刚钻在破损两边对应钻小孔，然后把铜卡子嵌在钻好的孔内，用小木槌轻轻锤实固定，这样碗就补好了！除了补碗，什么瓷瓶、瓷盘都可以补，方法是一样的。不过钻瓷器的钻头多为金刚石制成，硬度低的钻头根本不行。现在这个行当基本消失了，但是一句俗语“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却永远留了下来。

“打箍吧！”这是箍匠沿街吆喝声。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打箍”是怎么回事，那时，塑料桶、盆还没有出现，家家户户用的挑水桶、洗衣盆、洗澡盆都是一片片木头围成，外面用铁丝打两道箍固定成型，然后刷上桐油防漏水。这些木器用上一段时间就会磨损、开裂、松动，就要请箍匠修整紧箍加固，于是就有穿街走巷的箍匠了。现在很少用圆木器，箍匠也少见了。

“下河吧！”下河就是倒马桶，以前

倒了马桶后就在河边洗涮，下河就成了倒马桶的代名词。这种习俗1980年代在江南水乡仍有保留。那时，住户人家没有卫生间，公共厕所也很少，我们叫厕所为“茅室”，下面是个大粪池，上面用木板搭建，一般有20多个蹲位，之间没有遮挡，大便时相互面对，不雅之相尽收眼里。就是这样的厕所也不多，往往几条大巷子才有一个，每天清晨排队等候上厕所的人急不可耐的表情，可是一种市井百态！女子一般在家里如厕，基本上每家都有一个马桶（也叫围桶），放在带盖的方形木柜里。木柜名字很好听，叫金柜，这也是女子的陪嫁之物，安放在房屋角落，用布帘遮挡，就是家里的厕所了。每天清晨，就有粪车停在街巷边，吆喝着“下河吧”，各家各户把马桶拎出来，倒入粪车内。也有的人家花钱请“下河”的，每个月大概三五块钱，天不亮，进屋来倒马桶并洗刷干净。“下河”的都是女工，现在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善，这个职业消失了。

“卖水哟！”1950年代，自来水网点没有完全形成，人们基本上吃河水，把水从河里挑回来倒在缸里，用明矾消毒沉淀。那是一根竹棍，里面打通放明矾，外面打小孔，放在水缸里搅动，达到净化水质的效果。这样就催生了挑水卖的职业，他们从河里把水挑到买水的家户人家，赚点力资小钱。后来设立自来水供应点，一分钱一担，先买“欢喜”（竹签样的标牌）后放水，挑水卖的仍延续了一段时间，直到自来水安装普及到千家万户。

李胜洪，退休前任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印刷厂厂长